

發展策略

No.15 July 2007

2007年7月 第十五期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Centro de Pesquisa Estratégica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e Macau



目 錄

發策地帶

理事長的話	蕭志偉	1
二零零六年度會務工作報告	蕭志偉	4
第四屆領導架構成員名單 (2007~2009)		13

政經綜論

建立“和諧澳門”的幾個問題思考 ——基於市場體制和開放創新的路徑依賴	殷存毅	15
和諧社會的天秤：權利和責任的原則取向	尉東君	23
中國內地社會轉型與政治文化發展趨勢	李家興	29
港澳管治問題研究	郭敬文	42
外來勞工與澳門人力資源 ——淺析澳門市民對外勞的看法	吳若湘 田青 楊日科	62
不要要求政府為你做什麼	葉建華	73
和諧社會	愛麗斯	78
安逸與怒吼之間	水月	81

編者語

編者語		87
-----	--	----



發
策
地
帶





理事長的話

蕭志偉

今天的澳門，變化巨大，有成績，有教訓。但總的是在發展中，社會繁榮了，生活逐步改善了，但市民的要求更高了，社會上的“噪音”也多了，這的確使到長居安逸的我們感到不習慣，躁動也就很正常。但是，“風物長宜放眼量”，在歷史滾滾長流中，這些變化很可能只是驚鴻一瞥而矣。有幸身居大時代，我們當然不希望一時躁動打亂澳門發展的陣腳，由此，大膽前瞻未來，務實做好當下，正是我們建澳者當取態度。

轉眼之間，本中心成立已近十年，這十年來，有幸得到社會各方友好人士、團體的支持及關愛，使本中心能夠健康地成長，過程中，確實取得了一點兒的成績，雖然如此，不足之處還是存在著的，而為了探求本中心新的發展路向，以及查找不足的地方，在去年，本中心就舉辦了“齊為發策動腦筋”集思活動，以集合全體會員的智慧，為本中心的發展定位及可持續發展的機制獻謀略，活動總結出許多可操作性、有利於本中心發展的意見建議。

繼續秉承宗旨，堅持以“是其是，非其非”的態度審視特區政府的發展，以客觀持平、兼容開放的態度、前瞻的視野去開展研究，以推動社會的理性思考，發揮作為民間智囊應有的表現及承擔的使命，此一總體信念，十年來，本中心從未間斷過，反而不斷自我鞭撻，務求做得更好。

一．集中內部力量，辦好十周年會慶活動

今年是中心成立十周年的大日子，五年一小慶，十年一大慶，是一傳統習俗，在這十年中，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與澳門廣大市民共同見證了“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的成功實踐。反之，我們亦希望在本中心十周年的喜慶日子，能與本澳各界好友共渡歡欣。



集中力量，辦好慶祝中心成立十周年的會慶系列活動，是我們今年的重點工作。而新一屆領導層，亦重整內部力量，組成會慶活動專責小組，讓會員分擔不同的工作，目的是推動會員的積極性，希望透過會務工作的直接參與，能讓會員顯現自身的才華，以集體智慧，齊為“發策”、為澳門獻計。

二．加強對外聯繫、團結

我們相信，集腋可以成裘，團結就事成的真理，因而，本中心將一如既往，在對外聯繫方面，繼續加大力度，與社會各界，甚至澳門以外的相關機構聯繫、交流，希望能夠就一些具啟發性、有利於澳門整體發展的議題，引發更多社會成員的廣泛討論及關注，共同推動澳門社會的健康、和諧發展，讓澳門有一個又一個的豐盛的十年。

三．推動政府、團體、市民齊齊為澳門

“一國兩制”實踐初步成功，成績得來殊不容易。除中央全力支持、基本法提供強力保障外，我們還得到許多彌足珍貴的經驗。本中心為繼續秉承宗旨，致力參與“一國兩制”的實踐，將藉十周年會慶舉辦一系列的慶祝活動，當中“齊為澳門動腦筋”將是主要活動之一，主題方向將以“從澳門整體發展角度看，政府、社團、市民三者，各自應扮演怎樣的角色？發揮怎樣的社會功能？又如何從自身做起，以發揮應有的社會功能？”為主，我們明白到，和諧的樂土，是所有澳門居民心目中的理想，那麼，可知要築成這一片樂土，是否單靠匹夫之力就可成呢？相信答案早在大家心中。

在去年，我們曾舉辦過主題為“齊為澳門動腦筋——動態和諧，你我共建”大型座談會，會上社會各方代表發表了值得深思的意見，而今年，我們希望延續和諧之聲，並希望帶出的，就是其中一個重要啟示，要構建一個和諧的澳門，並非單靠某部份的社會成員的力量就可以成功的，而是需要社會全體成員（政府、

社團、市民）共同努力的。

四．結語

由成立至今，十個年頭，本中心有幸得到各政府有關部門、各大社團機構、各界友好、廣大市民的關愛、指導，在中心成員長期的努力及支持下，使我們慢慢地成長起來，本人謹再一次代表本中心，向各界表示誠摯的謝意，並期望在未來的日子裡，繼續得到大家的鼓勵和批評，好讓我們能在監督和糾正下，繼續為澳門的繁榮穩定、健康和諧作貢獻。



二零零六年度會務工作報告

2007年2月7日

蕭志偉 理事長

主席，各位會員：

受理事會委托，本人現向大會作會務工作報告，請各位審議。

一．二零零六年度工作回顧與總結

過去一年，在本中心各領導機構的關心和各位會員的積極參與下，理事會秉承本中心的宗旨，並根據上年度會員大會的建議，全力以赴地開展各項會務工作，並取得一些新的進展。下面謹分別向大會作簡要匯報。

(一) 二零零六年度工作回顧

1. 開展課題研究

過去一年，中心課題研究的主要進展情況如下：

- (1) “澳門房地產業的穩健發展”的課題研究剛已完成，研究成果將先作本中心內部參考。
- (2) 與華僑大學商學院可持續發展與城市經濟研究所組成的課題組，繼續共同完成今年“澳門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報告。
- (3) 剛與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合作開展“博彩專營權開放以來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評估與展望”課題研究。

2. 舉行公開研討／座談

主要有：“齊為澳門動腦筋---動態和諧 你我共建”座談會、中心成立九周年會慶活動——“透析內地發展新趨勢”專題演講會，介紹內地城市化發展趨

勢，尤其是天津濱海新區的發展，以及介紹中國社會轉型的現狀等問題，內容引起社會關注及思考。

此外，中心還舉行了“2006兩會專題座談會”，並與澳門經濟學會、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合辦了主題為“澳門可持續發展的機遇與挑戰”的專題研討會。

3. 舉辦“時政沙龍”及內部座談

全年共定期舉行了9次“時政沙龍”，議題主要涉及新城規劃、五一遊行的思考、前瞻特區施政報告、捷運系統等等時政熱點，並嘗試透過傳媒向社會發佈討論的重點，為社會發展獻計獻策。另外，中心舉行了一次以2007年度施政報告為主要討論內容的內部座談會。

4. 推進理事會的會務工作

根據上次會員大會的安排，理事會積極並量力而為地推進會務進展，除安排專人跟進各具體會務外，還舉行了3次常務理事會議和5次理事會議，以檢查推進工作。常設秘書處人員亦在人力資源緊張、勞動強度持續偏高的情況下，敬業樂業，為中心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我在這裡，謹代表理事會對各同事的優質服務，表示誠摯的感謝。

5. 對外交流和對內聯絡

為加深會員對澳門發展動態的掌握，本中心於2006年5月份組織會員參觀本澳其中一項大型的博彩業投資項目——“澳門威尼斯人渡假村酒店”，使會員對未來龍頭產業的轉變有更直觀的認識。中心部份領導層成員也應邀考察了當時即將開業的永利酒店，及時瞭解不同的博彩旅遊企業的發展模式。

除了日常的聯絡溝通、活動訊息等資源傳遞外，秘書處還在工作較為緊張、人力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多次主動向會員提供參考資料，以鼓勵會員的思考和研究。



6. 會員凝聚及培訓工作

2006年6月份正式開展優秀會員獎勵計劃，計劃實施以來，會員的參與度有明顯改善。活動工作小組現正就會員參與中心活動情況進行評比當中，將於稍後公佈優秀會員得主。

“齊為發策動腦筋”集思活動是中心成立以來首次舉辦的活動，亦是2006年中心的一項重點工作，會員們就中心未來的發展定位和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機制，提出了不少的意見及建議，三位香港民建聯嘉賓還應邀在會上介紹民建聯的發展歷程，並與會員們進行經驗分享，尤其是吸納年青成員方面的經驗。

藉中心成立九周年之際，舉辦演講餐會，邀請內地學者就澳門發展形勢和台灣兩市市長選舉後的政治局勢進行分析，增進會員的見識。

7. 出版工作

過去一年，中心出版的刊物主要有：《發展策略》第十四期、《齊為澳門動腦筋——動態和諧 你我共建座談會——發言彙編》。

(二) 會務發展的一些特點與不足

1. 在過去一年以來，本中心堅持宗旨，並以與時並進的理念，繼續務實推進會務。總體而言，本中心去年會務的發展主要體現出以下幾個方面：

(1) 認真檢視中心運行方向，致力強化自身建設。

變化程度加快，是澳門社會近年的發展基調。本中心植根澳門，並作為澳門社會的一員，當然亦面對相同的客觀現實。如何在這一潮流中，既堅守基本宗旨，而又保持較旺盛的生命力，從而能以兼具質素和特色的會務表現，有效參與“一國兩制”實踐，是中心領導和會員近來尤其關注的根本性問題。為此，理事會透過系統安排，積極推動自我反思，努力強化中心的素質。首先，我們嘗試並

成功舉辦首次大型集思活動，有效推動會員全面檢視中心運行方向，不但收集了大量有價值的意見建議，更進一步促進了中心和會員的溝通，凝聚了會員的意志，提升了會員參與中心工作和活動的主動性。參與集思活動的會員認同中心繼續秉承宗旨，堅持以“是其是，非其非”的態度審視特區的發展，從客觀、全局、前瞻的維度思考並提出澳門的發展策略，根據社會發展的動態而開拓創新，致力提升具水準和可操作性的意見建議。集思會的基本共識，將成為本中心新一屆領導層開展工作的重要依據。其次，過去一年，多項活動成立專項籌備工作小組，並以較為獨立的模式自主運作，分工相對清晰，會員參與的積極性有所提高。再次，本中心業已嘗試推舉和推動成員參與特區的諮詢組織和活動，在服務社會的同時，讓會員得到更多的實踐空間。

(2) 弘揚客觀、健康的理念，推動社會的深層思考和探索。

在本年度“齊為澳門動腦筋”的大型座談會上，本中心提出了建設“動態和諧澳門”的理念，引起了社會的熱烈討論和關注，推動了社會對該理念的進一步探索、落實。事實上，“動態和諧”的理念，並非本中心個別人士的先知先覺，而是經過多次“時政沙龍”等會員的熱烈討論，共同形成的集體智慧。應該說，“動態和諧”的內涵及其逐步形成過程，本身就體現著“動態”的意義，需要透過我們的探索和推廣，使其內涵得以進一步豐富。需要強調的是，透過內部較充份討論，再推動社會共同思考的理念探索模式，是值得中心重視的重要經驗。

(3) 定期舉辦座談研討，提供意見交流平台，提升會員思辯水平。

“時政沙龍”是本中心一項極具潛質的定期座談活動，除了討論“瞬間民意”的熱點話題，亦會就社會深層次問題繼續進行思考。2006年度沙龍繼續根據論題，邀請會內外專業人士或有較深入研究者作專題發言，並邀請部份會外友好人士參與討論。需要珍視和發揚的是，中心所舉辦沙龍以至其他形式的座談，以促進澳門健康發展為目標，始終倡導學術自由，尊重參與者的觀點。故此，座談



發言氣氛熱烈，不同取態充份展現，意見交鋒並不罕見，會員和其他與會者並無包袱，輕鬆表達意見和建議，與會者亦在此過程中拓寬個人視野和深化思考。一些沙龍中初步形成的觀點更成為後來深入研討的課題。

2. 有待提升之處

在充份肯定過去一年所取得成績的同時，中心亦存在不少有待提升、改進之處。其中，理事會認為需要重點提出的是：

第一，成員參與程度參差，人力資源的配置有待改善。這是中心積存了幾年的老問題，一直未得到有效解決，亦使得這幾年的會務發展與人力資源緊絀形成頗為明顯的矛盾。如何發揮現有會員潛力和引入更多有一定質素的新成員，應是新一屆理事會重點推進的工作。不應迴避的是，本中心所舉辦的活動之中，已多次出現“外熱內冷”的現象，中心以外成員出席情況和參與投入程度，不時明顯優於本中心成員。這裡面無疑絕大部份責任應由理事會和相關組織者承擔，但是否也反映出部份成員根本對參與社會思考不感興趣呢。如何發揚民主，重用人才，吐故納新，保持和強化我們這個尚算“新興”社團的活力，是全體會員，首先是三級領導層成員都不能迴避的重大挑戰。

第二，會務運作模式有需要重新予以審視。參與集思會的絕大多數成員認同中心始終堅持的宗旨，但對在當前會務發展的形勢下，本中心會務運作模式的定位存在不同看法。如何在堅持主動推進社會進步宗旨下，平衡課題研究和理念倡導、如何整合專業研究和多元觀點，如何兼顧即時反應和深入研究，均非只憑決心和良好願望就可以自然得到解決。因此，新一屆領導任重道遠，全體會員亦具有相應的責任，“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必須及時研究出新時期的發展策略。

二．未來會務發展的構想

透過集思活動等渠道，會員們就中心各方面的發展情況提出了不少有價值

的意見，充份反映出大家對中心的支持和期望。理事會予以高度重視，整合、形成了未來一段時期中心會務發展基本思路的構思，特提請本次會員大會研究、修訂、通過，然後由新一屆理事會分階段貫徹落實。

1. 從澳門發展大局出發，積極參與“一國兩制”實踐

本中心自成立之日起，即以研究澳門發展策略，推動社會健康發展為己任，此一基本價值觀，在去年的集思會再次得到會員們的充份認同，這正是中心日後繼續開拓的動力泉源。回應集思會的一些建議，我謹代表理事會說明兩點：其一，我們認為，特區政府和基層市民的角度未必相同，但彼此的根本利益卻並不衝突。本中心絕無需要、也無能力成為另一形式的“類政府部門”，中心確應多從基層出發，觀察和分析問題。但社會是多元的，“基層”的內涵也是變化的，故此，中心始終應以澳門整體利益為依歸，以全局發展為研究的立足點。其二，我們認同，作為澳門社會的一份子，自覺參與“一國兩制”實踐是應有之義。可以肯定，特區和特區政府的整體進步，與市民個體發展始終密切相關。事實上，絕大多數澳門居民，均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彼此分歧，往往在於對“支持”的理解和落實。我們所理解的“支持”，則是一個複合的概念，只要是符合澳門整體利益，發表尖銳而準確的批評、提出獨到而客觀的意見，都是對特區和特區政府的有力支持。當然，批評與建議，孰易孰難，各人均可有不同見解。基於共同承擔、共同進步的認知，本中心將發揮自身的獨特優勢，致力於從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平衡、長遠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協調去作綜合考量，探索社會發展規律。中心既要“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還要涉足“是”與“非”中間寬廣的灰色地帶，深入研究“是”與“非”背後的深層意義，提出澳門發展的建設性策略。

2. 不拘一格，重用人才，強化中心人力資源

針對中心人力資源不足問題，新一屆理事會將設立專門部門進行深入的跟進，並及時向全體會員作出通報。初步思路是：



(1) 採取主動措施，適量增加會員人數，尤其是年青的，有一定研究能力的會員，並適當放寬入會條件，以吸取更多有志之士。

(2) 大力培養人才，強化領導層建設。我們尊重認同集思會有關保持領導層相對穩定的共識。但是，會務發展的確需要更多有質素、有能力、願承擔的會員參與領導工作。故此，本屆領導層將出現較大程度的更替。多位身兼社會數職的負責人全力推動人才培養，主動退位讓賢，但同時又表示將繼續全力支持中心發展，表現出可貴情操。領導層成員將在基本穩定的前提下，推行“可進可退”的原則，即領導層依舊三年一任，但根據實際情況，每年會員大會均可對領導架構進行適當微調，兼顧中心的穩定和活力，為中心可持續發展創造條件。

(3) 培養分領域研究人才，試行發言人計劃。根據集思會的建議，理事會將積極研究成立若干個小組，就社會幾個較主要的領域成立專題研究小組，開展較長期的跟進研究，並設立快速反應機制研究社會突發事件，還可考慮透過推舉發言人，適當向社會發表中心觀點，並藉此訓練人才。在該計劃試驗啟動階段，必須量力而為，實事求是，先就一兩個領域展開嘗試，視實踐而逐步推進。

(4) 完善組織架構，使分工更加清晰。經過幾年的實踐發現，理事會成員應明確分工，使分工細化，並承擔應有的責任，以更好地推動各項會務的開展。

(5) 理事會除定期檢查、推進會務外，還將就集思會和本次會員大會所提出，有關本中心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問題，開展專項的、深入的研究，並以擴大會議的形式，鼓勵會員群策群力，以有力的跟進，回應會員們對中心的期盼。

集思會有不少意見指出，建議在專職辦公室中，引入企業營運模式。我們認同這是一種新思維，但我們亦坦白承認，至目前為止，我們的相關研究還很不充份，需要進一步探討，亦希望大家提出更多的可行建議。

此外，中心電子網頁和內部討論區正在全面升級換代，相信無論在強化內部

溝通、分享會員的研究心得方面，將起到新的作用。

3. 倡導系統思維，調整課題研究安排，提升時政沙龍效益

近年，中心所開展的研究較為偏重、規模較大、時間跨度較長的課題。而由於近年澳門社會發展變化速度較快，需要及時探討的社會問題較多。故中心擬考慮，課題研究的開展採取長短結合的方式，在量力開展一些重大而深入課題的同時，考慮開展一些短期研究，有針對性地快速回應社會比較關注的問題，形成較精簡的研究結論或建議。中心將整合各成員所擁有的不同專業優勢和評議能力、研究社會發展深層問題、適當避免研究題目的類同性，從而為社會作出有特色、具質素、富效益的承擔。

“時政沙龍”一直是中心較為重要並受到肯定的研討模式，中心將在原有的基礎上，弘揚系統思維，既努力使沙龍與社會時政緊密呼應，亦力求使之與中心其他活動有機整合。沙龍中提出的有價值的問題，可作為立項研究的其中一個依據。同時，在堅持基本定期舉行的基礎上，理事會將廣徵會員意見，研究切實提升本中心成員的參與率、沙龍研討成果的及時分享，努力提升此項活動的效益。

4. 加大培訓力度，提升會員素質

正如各位所深刻認識，澳門社會正發生著不可逆的、較快速的變化，動態也就成為常態。每一個澳門人、每一個在澳群體，無論自覺或不自覺、主動或被動，都要面對。是應當坐而論道、隔岸旁觀、怨天由人；抑或積極提出和推動社會發展方略，並及時提升自身的素養，相信大家都有正確的判斷。發策既是澳門一份子，亦同樣面對競爭，同樣要謀求發展。提升中心的競爭力，除與宗旨和任務的明晰外，還涉及多個環節的共同努力，而會員素質的提升則是至關重要的一環。理事會將吸收過去一年的一些創新安排的經驗，加大培訓力度，鼓勵會員提升素質、增強會員的凝聚，並確保中心的可持續發展。為此，新一屆的理事會將繼續舉辦集思會、座談辯論、適當的考察，並考慮開展專題工作坊。



5. 籌備中心10周年會慶活動

今年中心將邁入成立第十周年，亦是發展的新階段，新一屆理事會將在這具有特別意義的年頭，總結經驗，前瞻未來。因此，中心決定盡早成立10周年會慶活動專責小組，總結經驗，從新的起點再次出發；同時，藉此機會，舉辦一系列有特色、符合中心宗旨的活動，以推進會務，服務社會。其中，中心擬在今年，利用中心的網絡優勢，適當邀請較多的，具有真才實學、真知灼見的外地和本地學者，舉行系列演講，以拓展會員和社會人士視野，引入新思維。為此，新一屆理事會將及時廣納會員建議，盡早推進籌備工作。

三．結語

在未來的工作中，相信新一屆的理事會將會延續之前的優良傳統，適當加入新元素，並逐步開展各項具體會務。而中心未來的發展，關鍵仍取決於大家的共同參與及努力。理事會衷心希望，會員們能對我們的工作給予大力支持，使發策能夠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在新形勢下走出具自己特色的道路，為“一國兩制”的全面落實作出新貢獻。

最後，我謹代表理事會向本中心各位領導、會員、同事致以誠摯的謝意！

我的報告完了，謝謝大家！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第四屆領導架構成員名單

(2007~2009)

會員大會：(名單按姓氏筆劃排序)

會長：梁維特

副會長：何桂鈴、陳少雄、劉藝良

秘書：李淑冰

理事會：(名單按姓氏筆劃排序)

理事長：蕭志偉

副理事長：林玉鳳、梁慶球、馮家超

理事：余惠鶯、高少卿、尉東君、郭敬文、黃義滿、楊日科、葉建華
王樺、成向陽、余榮讓、陳子駿、陳俊拔、鄭玉球

[註：有底線者為常務理事]

監事會：(名單按姓氏筆劃排序)

監事長：劉本立

副監事長：何華添、林潤垣、關恩賜

監事：高展鵬、陳澤和、曾澤瑤、黃永謙、鄭國強



政
經
綜
論





建立“和諧澳門”的幾個問題思考*

——基於市場體制和開放創新的路徑依賴

殷存毅教授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對於澳門發展的問題，確實引起人們的關注，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北方。因為在南方、在廣東，已有不少學者研究澳門，但在北方，研究香港已經不多，研究澳門的，便更是想不出來有多少個。故此，我是抱著一個嘗試的心態來談談澳門的問題。

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曾讀過一本書叫《小的便是美好》。自此以後，對這種小的、微型的經濟體便有所注意。之所以說她是美好的，是因為一個小的經濟體或一個小的實體，她可能在發展過程中較容易克服一些大的經濟體、大的實體所非常難以克服的問題，她的成本實際上是非常少。在這問題上，澳門是一個小的實體，而且從現在看來，也是非常美好的。

首先，從“小的就是美好”作討論的起點。對國際上小的經濟體，我們大概做了一些調研，前一段時間我到日內瓦開會的時候，特別跑到聯合國的有關部門，就歐洲幾個微型經濟體內的經濟、政治、社會等特點查詢過一些資料，並做了一些總結。

小的經濟體是有一些共性：第一，產業結構比較單一。因為她小，比如歐洲的列支敦士登、摩納哥、安道爾等，她們的產業結構都比較單一，且以旅遊業、離岸金融業為主。一方面，在地理上都靠近一個大的經濟體，也就是說，她把她的經濟實際上和周邊的，大的經濟體融為一體，所以她和周邊的大經濟體的一體化程度非常高；另一方面，就是這些微型經濟體的經濟規模是小的，政府也是小的，也即是小經濟、小政府。而根據這個特點，使我想一個問題，就是澳門是

* 殷存毅教授在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成立九周年演講餐會上的發言，經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整理並經殷存毅教授確認。



小的，而澳門在回歸祖國後，她的發展無疑跟中國的發展有著一種示範和學習的效應。中國的發展有一個特點，就是政府主導。政府主導的概念，就是在經濟領域上的大政府。我跟外國學者談論到澳門時，他們曾提及“小經濟，大政府”是否澳門未來發展的一個模式。我想，這個模式的未來，從理論上是怎麼一回事，從現實上又是怎麼的一回事，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根據這個層面，我認為在探討澳門問題時，有兩個最基本的觀點，或者說是追求：第一，澳門未來的發展，肯定是要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來追求的，或是說要朝著市場經濟的方向走，這是已得到共識的；第二，一定要堅持開放創新。因為這是任何一個地區、國家的發展，尤其像澳門這樣一種背靠大陸這個大型經濟體的環境下所必須的。整個中國的發展都是在開放和創新的大背景下取得成就和走向未來，所以這是一個大環境和大觀念性的決定。我就是基於這兩個基礎性的觀點去思考澳門的問題。

今天，整個中國非常時髦的一句俗語就是和諧發展、和諧社會。不同學科、不同專業在理解和諧的時候，有著不同的詮釋。用經濟學和經濟發展的角度去理解和諧的問題，有三個關係是要處理好的。

一，發展和環境資源的協調。環境資源的協調，它不僅僅是人們慣常所指的環境污染的問題，從經濟學最本質的角度看，它跟當地的資源稟賦要相符合。

回歸以來，澳門經濟有了飛速的發展。從2002年後，這個增長的速度是高速的，而這種高速增長很大程度是得益於博彩業的賭權開放，所以澳門的產業結構，根據中央的精神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戰略規劃，是以旅遊博彩業為主，適度多元化，但關鍵是怎樣去理解適度多元化中的適度。談到旅遊博彩業為主，可以說旅遊和博彩實際上是相互配套的，也是相互關聯的。這也有不同的看法，就是說目前這個狀況，我們確定的這種策略或者說這種產業的結構和型態，是源於我們資源稟賦的局限性，在二十八平方公里的有限空間上，資源也非常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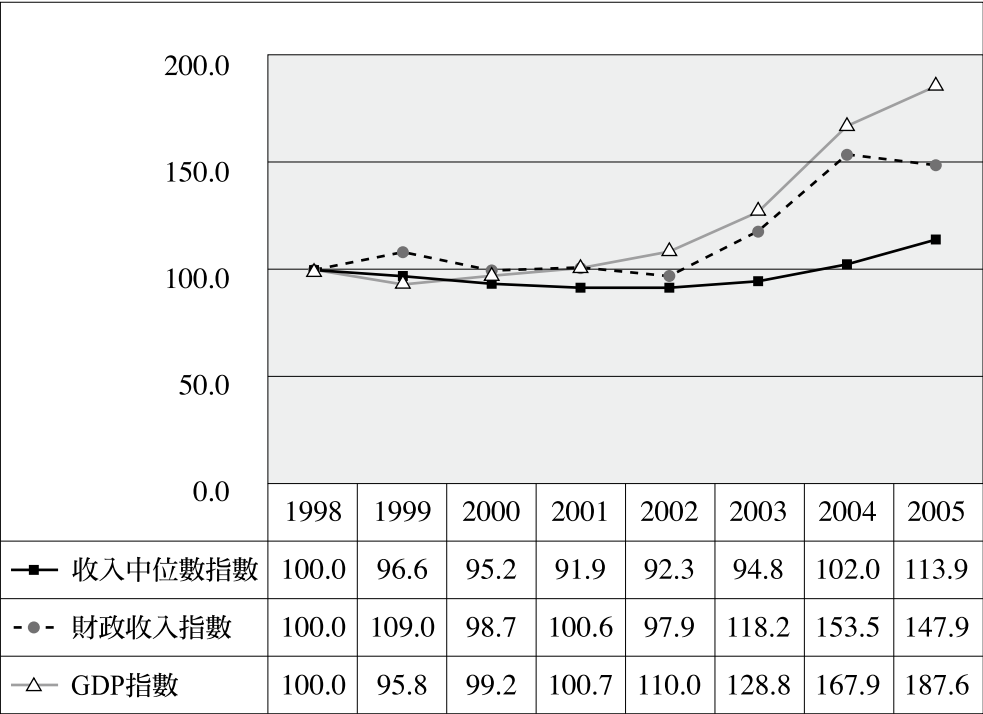
人力資源等等也不足，可說是迫於現實之下做出的選擇。可是，在未來的發展中，要謀求更進一步的發展，突破空間局限是澳門長遠發展所不能迴避的問題。

二，社會關係的協調。實際上就是要體現以人為本，要體現社會公平。但在體現社會公平的過程中，純粹讓市場經濟自由操作會導致市場失靈，導致社會不公平。矯正以上現像的這只手，是一隻看不見的手，那就是政府。但是政府同樣也會存在政府失靈，就會埋沒了效率，要拿捏當中的平衡和均衡，在社會政策上，是世界上每個國家和地區都在探索的問題，也有一些積累的經驗和教訓，我想這個問題對於思考澳門未來發展的社會關係的協調是非常的重要。

社會分配公平與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檢驗指標，就是看這個社會的就業率和社會分配。因為若失業率很高，則這個社會的貧富差距就很大，很可喜的是澳門的失業率恰好在正常範圍之下，這個失業率擺在任何國家和社會都是正常的，而且要做到百分之百不失業是任何國家都不可能。但資料顯示，在分配當中，GDP的增長和人們的分配應是一個正相關關係。就是說，經濟增長越大，分配和收入的增長便越快，這是理論上的關係。僅僅從理論的角度來看（見圖一），澳門人的收入分配曲線與GDP曲線間的空間存在拉大的趨勢。當然，這並不代表澳門現在有多大的問題，但可從中看到她的趨勢和警示。



圖一，澳門財政收入、GDP增長與居民收入增長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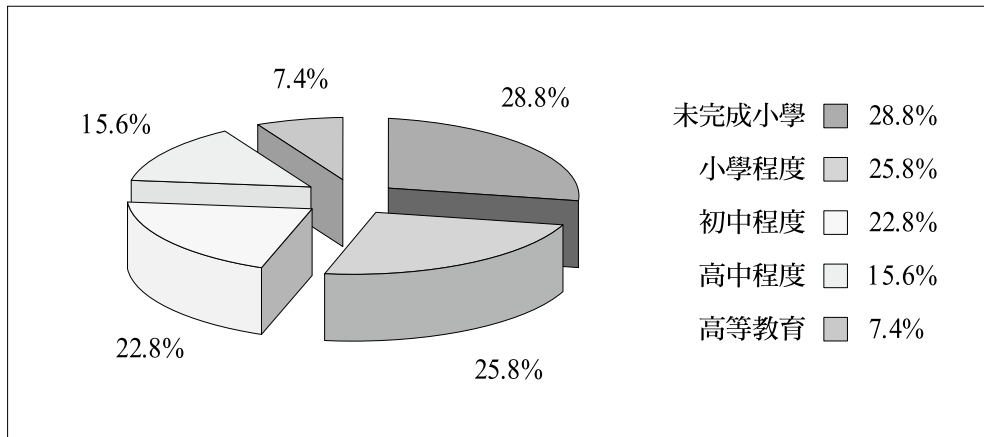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以1998年為基期100，計算收入、財政收入及GDP的增長，其中收入以中位數衡量。從收入的角度看，GDP反映的是居民、企業和政府的分配關係。收入增長速度的滯後實質是居民收入水準的相對惡化。

在這問題當中，我們經過一些初步的考慮和分析後，發現澳門在分配問題上有兩個悖論：

一，人口結構的問題。澳門人口結構中，學歷介乎小學、初中和高中程度佔總人口結構的近三分之二（見圖二）。按照一個正常社會的發展，這部份的群體應列作社會中的低收入階層，但在澳門不然，這是理論上的悖論。在澳門不然就是得益於澳門以博彩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如在博彩場內負責發牌的人員，按資料分析，其文化程度是相對較低，但能享受到一般其他社會中產階層的收入水準和生活待遇。故若以此來談澳門社會分配公平與否，實際上僅按理論的資料看，往往不能符合澳門的現實。所以，這個問題是澳門的產業結構決定了她在理論上的一個假像。但其真實的情況，就是說她分配上的差距不像資料上反映的嚴重。

圖二，澳門居民的教育程度結構



二，福利保障問題。我們都知道，要建設和諧社會，社會福利保障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工具，是實現社會公平的最主要的工具。這工具的原意是透過政府干預的做法來矯正市場失靈，但如果干預的不得當，就會出現政府失靈。政府失靈的後果就會導致社會經濟的效率下降，這方面在世界上是有先例的。我們在談世界上的國際競爭力的時候，高福利國家的國際競爭力都令人堪憂。比如加拿大，她是一個高福利國家，但其人才流失非常嚴重。因為高福利就伴隨著高稅收，這是正常的和相互關聯的，而高稅收就會使高收入的社會精英流失。所以從一般的意義上來說，政府在實行社會保障的時候，不能完全由政府埋單，或者大部份是政府埋單，政府、市場化和個人承擔的三位一體結構是必需的。比如像美國，她的政府在支出方面基本上是不多的，她對企業稅收的徵收也不算很高。至於澳門，我粗淺地認為，第一，根據澳門社保基金的結構來看，澳門在社會保障這一塊，福利主義的色彩比較重。現在澳門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受益於產業結構中的賭權開放所帶來的大量新的投資，但澳門博彩業未來的競爭力，還有待時間來檢驗。故在安排其他問題的時候，以中國人的傳統智慧來說，便是應有最壞的打算。況且，高福利這種制度，一旦形成了依賴，到將來再要推行改革時，其成本將會非常大，民眾的反彈也會非常大。故此，儘管澳門政府今天的經濟和財政狀況還不錯，但是否應有節制地和有意識地引入一定的市場化機制來建立這個保障體系，我認為這是澳門要建立一個和諧社會所值得考慮的戰略性問題。



三，和外部的協調。我們知道，今天任何一個社會及經濟的發展，實際上都面對著全球化的危機，或者說，都面臨著開放的問題。這個開放，一個是全球化，我的理解是國際之間的交流和開放；還有一個，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當中，區域與區域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協調，確是非常重要的問題，而且也是中國經濟發展中非常棘手，難度非常大的問題。但是如果談到協調，談到和諧的發展，這問題若沒有一個很好的解決或是不去注意，則同樣是很難達致和諧。

首先，澳門是跟珠三角和廣東省的粵澳合作已成為其對外合作的核心；其次是泛珠三角。當然，澳門與全國各地都存在合作的空間。但是，經濟發展上考慮的就近原則是一個最經濟的原則。因為當空間跨度太大，比方說到黑龍江去，就算黑龍江給你一塊地，你管理起來的成本也難以計量。而且也涉及到制度、跨域空間，這個管理成本是非常大的。這種先例，除了殖民地時代曾有過，一般正常情況下都很難找到，都是採取就近原則。

我們在區域發展和合作中的目標是什麼，我認為是需要對其認識清楚的。最近一年多來，我都有關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且一直認為泛珠三角的合作目標仍不夠清晰，並且欠缺激勵和約束機制。當中，只有廣東省訂立了自己的一套。翻查其他九個省的“十·一五”規劃文本，很多省對泛珠三角合作都是泛泛而談，更沒有提到泛珠三角跟她們間的關係。這樣的戰略目標不清晰，形成了一頭冷一頭熱的局面。那麼，澳門若要置身這個區域合作當中，便應該有自身的長遠目標，要令它清晰。

個人認為，根據澳門的經驗和實際條件，與珠三角、廣東省、甚至與泛珠三角的合作，要的是空間。空間，可有不同的概念。一個是生產發展的空間；一個是商品市場的空間。我想商品市場的空間是不用去爭辯，只要有一個生產要素、商品市場和服務貿易自由流動的體制和背景，便不會存在問題，關鍵是生產和發展的空間。

空間，實際上有不同形式。如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工業園區、或者自己創造一個名詞，這就需要制度創新。個人認為，根據就近原則和區域發展成本最少化，其實澳門與珠海在合作、協調和空間拓展的問題上應是首當其衝的問題。當然，在這當其中是有著其他具體的問題。因為空間合作就要配合著一套制度，裡面的空間不等於是以前澳門為主體來主宰這個空間，但澳門這套體制就必須在空間上得到發揮。當然，澳門和廣東同屬地方政府，故一定要爭取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給。

澳門要爭取空間，肯定需要一個理由。澳門現時的產業結構是以博彩業為主，而博彩業是一個獨特且受空間嚴格限制的產業，同時也無法以此作為與內地合作的內容。所以說，我們要以“兩條腿走路”。一條腿是發展旅遊博彩業，因為澳門百分之六十的稅收來自博彩旅遊業；另一條腿則可能是發展會展業。但是，未來澳門的社會發展還要伴隨著人的發展，而今天澳門人口素質的情況是無法滿足其產業發展的。人口素質的需求要根據生產活動的需要作變動，比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她對人口素質的需求也特別的高，而內地新發展的幾個亮點如昆山、東莞等都是台商和港商高度注資的地方，但現在令這些地區頭痛的便是其人員的結構，她因為只是製造業，而今天因為國家提出要改變增長方式，要加大自主創新能力，首先就是要改造這些地方，因為這些地區是最發達的。但是，礙於這個結構，她的研發中心需要的配套人才提供不了，結果要回過頭來辦學校。跟台灣合作來辦技術學院、高等學院，來重新彌補這一塊。

此外，澳門是一個微型經濟體。正如我們剛才提到的，世界上的微型經濟體跟澳門不一樣。這些微型經濟體與其背靠的經濟體，從體制上界定並非同一個國家，她是一種被迫性的融入。但澳門與背靠的內地則是同一個國家，在制度的變革上應比上述這些經濟體容易得多。這一點就是我認為的空間拓展，這包括空間的形式、如何拓展、制度上的配合等等。今天澳門可能認為用不著考慮這個問題，但這是一個動態的發展，而且社會上也提出了和諧發展是動態的概念。況



且，“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居安思危也正是特區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的。

所以，根據我對澳門情況的粗淺理解，我認為談澳門的和諧發展，一個是產業結構與資源結構的協調；一個是社會分配的公平和福利保障；還有就是區域的交流和合作。

綜上，我認為澳門要以開放、創新的博大胸懷來面對未來，來面對外面的交流與合作。在今天中國的發展中，發展得好的區域，儘管有其他種種條件，如區位優勢等，但是有一點，胸懷的開放和創新都是其中一個特點，不管珠三角也好，長三角地區也好，都具備開放和創新的胸懷，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對於澳門來說更重要。

而由於篇幅所限，我對澳門的看法就膚淺的談這一些，如有錯漏，希望大家指正批評。

和諧社會的天秤：權利和責任的原則取向

尉東君

自澳門開放博彩經營權後，經濟急速發展，政府財政收入水漲船高，亦陸續投放大量資源在教育、房屋、康體設施、大型基建和完善社會安全網上；與此同時，居民的就業機會和收入水平也相應增加。然而，在經濟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社會不同階層的關係卻呈現惡化跡象，市民與官員、資方與勞方、中小企與大型企業、公務員與政府間均逐漸出現相互埋怨的態勢，尤其在今年“五．一”遊行發生嚴重衝突後，一向賴以自豪的和諧，正備受考驗和挑戰。

當每天早上電台的政論節目播放著市民對交通、衛生、城規、教育、勞工和社會保障等問題的評議，報章上也經常刊載著議員和市民對上述問題的質詢，我們得承認，部份社會成員正行使其公民權利，試圖影響政府的社會分配政策。

有人會認為，上述的很多問題，緣於官員經驗尚淺，是管治的問題。筆者並不完全同意。比如近日坊間熱熾爭論的《道路交通法》，不少電單車駕駛者猛烈抨擊政府在現時全澳電單車泊位僅得二萬餘個的條件下，卻對八萬餘輛電單車的車主加重違例泊車罰則，對他們絕不公平云云。觀乎整份《道路交通法》由醞釀、向公眾諮詢、議會討論、以至通過，經歷了數年之久，但反對之聲卻只出現在法例通過之後，箇中因由值得深思。若論法例部份條文的用語是否清晰、公開諮詢的渠道是否足夠、法例條文有否考慮到本澳的現實環境、執行時的侷限性、以至其邏輯性是否嚴謹等，筆者同意確有改善空間，但不應與政府的管治水平混為一談。君不見關閘工人球場停車場、新口岸皇朝區停車場、祐漢停車場內的電單車泊位長期空置，但區內的違例泊車情況卻是極度嚴重。因為車主們認為把車泊入停車場太不方便，且過去把車在行人道上隨便一泊又不用付鈔。市民一方面嚷著泊車位不足，一方面卻就算有泊位也因“不方便”而視而不見。為此，更有部份激進車主揚言組織抗爭行動以示不滿。對於上述現象，筆者認為，本澳近年經濟急速發展，公交系統未能及時配合，且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較充裕，購買電單



車以方便上班和代步是一個較易作出的選擇，故電單車數量在短短兩三年間大幅上升。這是經濟發展引致交通秩序改變，同時也是社會各界同意立法重定《道路交通法》的前因。而部份電單車族的不滿，是他們認為自身的權利將被削弱，政府在此方面的社會分配未有充份顧及他們的利益，質疑分配準則的公正性和公平性。電單車族對《道路交通法》的批評是一例，其餘問題，細心斟酌也是大同小異。

筆者認為，經濟結構的改變直接影響政治勢力和社會秩序的平衡。經濟結構的改變意味著社會成員的收入改變，有人會變多，有人會變少。故此，社會各階層都會力圖重新訂定一套有利於自己的分配準則，尤其在因經濟快速增長帶來巨大財富的誘因下，重訂分配準則的意慾將更強烈。當各自的分配準則出現矛盾且未能限制在一定的秩序範圍之內，社會衝突將不可避免。導致社會衝突的因素有很多，例如宗教信仰、文化差異、種族和族群、意識型態、資源分配等等，澳門現時的問題，乃在於部份社會成員質疑資源分配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澳門因博彩業開放而引入高素質的外資企業，也因外資的帶動而加速社會現代化步伐，現代化促進了人們的維權意識。因此，澳門人近年因維護自身權益方面而訴諸行動的頻率正呈上升趨勢。同時，社會行動也趨向於激烈性和複雜性。當人們以公平、公正為由而加重其自身權利的法碼時，則必須回答其需背負的責任。畢竟，權利和責任是社會天秤的兩端，偏重任何一端都不會存在公平，沒有公平，和諧社會也就無從談起。

對於公平社會的構建，上世紀七十年代興起的新自由主義學派認為，個體自由和權利的本位是“公民社會”的基礎，個人權利的正當性及其社會保障是首位的。要保證個人的權利不受侵害，政府必須建立一套公平正義的社會分配程序和制度，以保障所有人的利益。在社會和諧（正義社會）的天秤上，這個學派認為政府要承擔更多的責任（義務），而公民則應享有更大的權利。代表這一派的論述主要有《正義論》（約翰·羅爾斯，1971）和《Between Utility and Rights》

(H.L.A. Hart, 1979)。¹

另一個是八十年代冒起的社群主義學派，他們強調的是公共利益和個人自由間的平衡，強調道德共同體的價值高於道德個人的價值，並強調社會、歷史、整體等非個人因素在人類道德生活中的基礎性和必要性。主張集體和社會的善必須得到尊重，個人的權利必須得到限制，社會的共同性優於個人自我的唯一性。也就是說，作為願意成為某一社會成員的公民，其所享受的權利應是有所限制的，且有義務為構建社會的善而承擔一定的責任。代表這一派的論述有《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A.麥金泰爾）。²

西方學術界就個人與集體之間的權利和責任的論爭至今仍方興未艾。九十年代初，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利希·馮·哈耶克以經濟學的角度，發表了《自由秩序原理》³一書，以更系統化的理論模式，進一步豐富了新自由主義學派的內容。至目前為止，羅爾斯的《正義論》和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都廣受西方哲學界所接受。一般認為，上述二者的理論具備嚴謹的系統性和邏輯性，而社群主義學派的論述則僅維持在雜亂的批評上，儘管社群學派的質疑是有份量的，但由於仍未建立其系統化的理論模式，在具體應用上未能得以開展。

然而，筆者仍較偏向於社群主義的觀點。筆者認為，和諧社會代表著社會秩序處於穩定和有序的狀態，一旦我們的社會因歷史、文化、政治和經濟等因素而轉變，那麼處於穩定的社會秩序也隨之而受到衝擊。化解衝擊的方法不外乎兩

-
- 1 Nicholas Bunnin, E.P.Tsui-James, 燕宏遠，韓民青等編：《當代英美哲學概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北京。頁：371-382。
 - 2 Nicholas Bunnin, E.P.Tsui-James, 燕宏遠，韓民青等編：《當代英美哲學概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北京。頁：383-386。
 - 3 筆者按，此書外文名為“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根據該書譯者鄧正來的介紹，漢語世界習用的譯名為《自由的憲章》，譯者改譯為《自由秩序原理》，主要是根據哈耶克本人在《法律、立法與自由》一書的導論上的說明，認為以此譯名更能表達哈耶克的本意。參見鄧正來譯：《自由秩序原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北京。



種：一是採用力強者勝的方法重建社會秩序；一是重建一套能被社會各階層所接受的核心價值觀，由社會成員共同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前者是霍布斯式的自由主義，後者則偏向於盧梭、黑格爾的社會契約論。社群社會很大程度等同於和諧社會。

我們都知道，和諧社會的核心所在是公正，而以個人權利放於首位往往是人們心目中的公正標準。人們在公平的天秤上，多只關注權利的一側而忽略責任的另一側。要維持天秤的平衡，要麼界定好權利的範圍，要麼加重責任的比重。回到《道路交通法》的例子中，電單車族的諸多不滿，為什麼不早在法例通過前向政府反映？向以社團社會自居的澳門，社團組織在法例諮詢的過程中有否扮演好政府與市民間的橋樑角色，如實反映市民的意見？電單車族們在買車時，有否負責任地思考一下日後的停泊問題？買車是否必要的選擇？假若社會成員能在作出行為抉擇時多從自身責任為起點，一連串的問題將可迎刃而解。

關於權利和責任的取向，林尚立提出了“從責任建構民主的公共生活”的概念。⁴林氏認為“如果各個主體僅僅從自身的權利出發，放棄其應該承擔的責任，那麼這種公共生活必然會因權利的擴展而失去應有的活力。因為，這種權利的擴展，本質上是權利的濫用，這種濫用可以體現為高度強調權利的絕對性，也可以體現為輕易放棄權利。”“在諸如教育、城市貧困、事業、控制犯罪和濫用毒品，甚至健康等方面，研究者們發現，更有希望的成功出路是公民參與社群。”要維護自身的既有權益，最佳出路莫如抽出時間和精力，主動參與社區事務，這便是承擔責任的其一體現。關於形成責任體系的基礎，林氏提出了五點內容：

1. 公民精神的培育。即從公民教育方面加強居民的負責任意識；
2. 社會團體的發育。即加強民間團體的建設和培育工作，讓民間社團發揮更大的監督和支持施政的功能；
3. 社會平等的促進。主要是要求在經濟與社會資源配置中，能更多地從

4 林尚立：“有機的公共生活：從責任建構民主”，見《權利、責任與國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5-29。

社會整體平衡作出發點，加強對弱勢群體的關懷；4. 政黨政治的理性。澳門仍未有政黨政治，但議會上不同階層和政見者，為討好選民而作出的非理性言論也是時有所聞。筆者認為，惟有加強政府施政的透明度，才能有效誘導政客以理性的態度議政論政；5. 協商社會的形成。

林尚立就建立責任體系提出的五點意見，對構建和諧澳門是有參考作用的。首先，澳門的社團社會已然成形，尤其是如工聯、街總、婦聯、中總等大型的傳統社團，無論從組織管理以至社會脈絡都具備深厚基礎。當然，坊間對傳統社團的評價是處事作風較為保守陳舊，在人員更新換代，吸納新血方面未有突破，同時在政治生活上支持政府有餘而監督不足，但瑕不掩瑜，相信假以時日，傳統社團的作為將會更上層樓。

公民教育方面，特區政府的政策仍是舉棋不定。公民教育的工作政出多門，沒有方向感和側重點。此外，要讓公民認識其責任所在，政府是有必要進一步開放社會事務的討論空間，讓更多社會成員承擔其應有的責任，為社會的發展出謀獻策。即，公民教育並不僅於宣傳推廣，更重要的內涵是開放空間讓居民直接參與。

社會平等促進是一個好課題，也是建構和諧社會的核心。平等是一個相對的價值取向，你心目中的平等不等於是我心目中的平等。華人社會經常面對的爭端往往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但若以平均主義來解決社會分配問題，將又會衍生內地過去在計劃經濟年代“做又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等生產力停滯的問題。要達致社會平等，筆者認為求教於社會心理學將有更大裨益。張學光的“中國人的分配正義觀”⁵是一篇不錯的文章，可供借鏡之處不少。例如張氏指出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社會都有不同的正義觀，故在分配正義上便存在先天上的差異。由

5 張志學：“中國人的分配正義觀”，見《中國社會心理學評論》第三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北京。頁：157-190。



此，他進一步指出社會的文化規範對於人們喜歡什麼樣的獎勵分配法則有著很大的影響。根植於教育、家庭、政治和經濟體系的規範會限制人們採用某些法則，而又鼓勵他們偏好另一些法則等。以之套用於當前澳門的問題，誠是現實的寫照。以房屋供應為例，老一輩的澳門居民基本上都在中年以上才可奢望置業，且大多數都同意靠自己胼手胝足、省吃儉用來完成目標，他們那一輩認為這是公平的。今天的情況則是，不少居民要求政府為其置業想辦法，年青人三十未過便希望擁有自己的私人天地，按他們的觀點，這也是公平的。問題在於，我們的社會有多少資源能夠回應來自四面八方的“公平”訴求，這方面社會心理學或能助我們找到答案。

和諧社會是人們嚮往的也是能擁有的，她絕非烏托邦或理想國。和諧社會就好比一台公平的天秤，權利和責任是她兩邊的法碼。一直以來，人們都會優先關注權利的法碼，因為權利的增加代表享有更多的福利，相信任何一個理性的人都難以抵擋權利的誘惑。當然，作為一個理性人，也應明白世上沒有白吃的午餐，只圖擴張權利而不願承擔更多的責任，和諧的天秤將會失衡，最終受損的還是我們自己。本文更多的從責任出發，介紹了學術界的一些觀點和見解，期望在構建和諧澳門方面提供多一點思考空間。此外，囿於篇幅和學養，本文在政府和社團組織的責任方面著墨太少，權利方面的討論也較為蒼白，特此說明。

中國內地社會轉型與政治文化發展趨勢*

李家興副教授 國際關係學院

前言

探討中國內地社會轉型與政治文化發展趨勢這個題目，說起來有兩個背景。

第一個背景。是大家說得比較多的“胡溫新政”，在媒體上和輿論中，關於胡溫新政的報導並不完全統一。但是，“清廉、務實、科學、法治”，是基本上大家都達成一致認識的。以人為本、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這些都是新一代，或者是新一屆政府一個新的發展建設的執政理念，也是探求內地新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發展戰略，也是我們國家現代化建設的一個根本的指導方針。這是本文話題的一個大的背景。

第二個背景。就是近年來，在我們內地的政治生活當中，出現頻率比較多的幾個詞語：執政能力、以人為本、科學發展、和諧社會。這些我想澳門的朋友也不陌生。執政能力，我覺得是政治操作層面的一個話題；以人為本，是一個理念的問題；科學發展，是一個發展方式的問題；和諧社會，是一個總的發展思想和發展目的的問題。

在這兩個背景的後面，有兩點是我要和大家一起探討的。第一，是經過二十八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模式，政治管理手段和社會治理方式，需要有新的、更加理性的選擇。這其中有哪些選擇的可能性？第二，我們的改革，是由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從經濟層面向政治體制和社會治理層面，以至文化心理的層面延伸。也就是說，社會轉型連動著政治文化的新發展。這些發展的趨勢有哪些？

* 李家興副教授在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成立九周年——“透析內地發展新趨勢”演講會上的發言，經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整理並經李家興副教授確認。



本討論主要是圍繞上述兩點而展開。

一．關於社會轉型與政治文化有關理論的探討

關於社會轉型（social transformation）這個概念，在我們國家，包括兩岸三地，應該說最早是由台灣的社會學家蔡明哲教授在其《社會發展理論——人性與鄉村發展取向》（1987）和大陸的李培林教授在其《“另一隻看不見的手”：社會結構轉型》（1992）提出的。我們國內研究這個社會轉型約有15年的時間。這個轉型開始時是一個社會學研究的課題，現在則被政治學引用來研究政治發展的問題。近來大家比較傾向於同意社會轉型有三種主要的含義：1）社會體制的急劇轉變；2）社會結構的重大轉變；3）社會發展的階段性轉變。但是，這三個含義也存在著一些爭論。

第一個爭論就是關於社會轉型的類型。這是一個比較理論化的問題。當中第一點是“先發自致”的類型。主要是指發達國家從社會內部首先發達起來，然後各自主動的實現社會轉型；第二點是“後發外生”。是指後發的國家，落後的國家，在外來的影響和壓力下，實現了轉型；之後還有“中心—邊陲論”、“依附論”、“世界體系論”、“全球化理論”等等，由於篇幅所限，也就不一一展開。

但是，關於社會主義國家，或者是前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問題，大家的認識都是比較一致的。基本上都是採用以下三種方式來展開分析，主要是以轉型速度作為衡量標準的，分別叫“漸進式模型”、“突變式模型”和“混合式模型”。“漸進式模型”主要是用於中國；“突變式模型”主要用於俄羅斯，也就是指俄羅斯改革的休克療法；“混合式模型”則用於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她們在轉型過程當中，一般沒有使用像俄羅斯的休克療法，也沒有採用像我們中國般從局部，從部份向整體延伸的一種漸進式改革。

以上是從轉型模式引發的爭論，當中的一些共識給我們很多啟發。

第二個爭論就是關於社會轉型的測量度的問題。與自然科學比較，人文社會科學的難度在於定量分析，以及對事物的準確測量。在社會轉型問題上，學者們根據不同的社會發展觀，制訂社會轉型的一些測量方法。從上世紀中期開始，世界上流行以“工業文明觀”來測量社會轉型的問題。“工業文明觀”主要是在衡量社會發展的標準的時候，把社會發展主要等同於經濟增長，並主要以經濟增長來衡量社會發展，而經濟增長是以國民生產總值（GNP）的提高和下降來作為一個標準。這種觀點，應該說長期影響著我們國家的發展，特別是在計劃經濟的時代。在改革開放初期，大家都是引用這個模式。但是，八十年代以後，特別是九十年代以後，以人為中心的社會發展觀逐漸進入我們理論界，政府高層、以及現在廣大民眾也逐漸認識和接受。

在這樣一個衡量標準的指導下，就形成了幾個有代表性的、具綜合評價的模型：第一個是關於我們社會轉型中的物質生活質量的指數。物質生活質量指數又包括了我們社會公民的自由、公平、安全和精神方面的因素；第二個是社會進步指數。它是彌補前一種的生活質量指數的不足；第三個是國際競爭力評價指數；第四個是人的發展指數。大家知道，最近一些年，內地每年都要評一個最具競爭力的十個地方城市，中央這幾年都給予相當大的重視。但是，今年的評選以後，中央電視台做了一個節目，把這十個城市的市長都請到演播室，然後主持人向他們表示，你們的排名可能有先後不同，但假設我今天要選擇一個城市去定居，你們如果想爭取我去的話，需要說明你們的理由。實際上就是說，你們不光要爭取排在前十名，你們還要說明是哪些指數使你們排到了前十名的。比如，人民的生活、感覺是否也很好？所以說，大陸在這個方面已從宣傳上，從政治上，從民眾的認識方向上開始進行探討。

關於社會轉型的度量指標體系，學者們已經做了很多研究。我這裡主要介紹中國（特別是內地）的社會轉型的“轉型度”問題。轉型度可以理解為轉型測量



的一個維度，大概分為四點。第一點是在經濟方面，是計劃的還是市場的？也就是計劃社會還是市場社會？它裡邊還涉及比如商品市場的定價率，即商品由市場定價的比率的多少；勞動力市場定價率，如果定價率在80%以上，就代表最高的組合；政府審批項目減少率，70%以上；立法公開聽證率，我國的立法聽證剛剛開始；幹部任用的票決率，這個在我們內地的民主建設部份當中，基層選舉已經開始使用票決率。第二點是“農村—城市社會”維度。也就是判斷我國社會是基本處於農村社會還是城市社會？即城市化問題，這裡不作展開。第三點是“工業社會與信息社會”的維度。第四點是“貧困社會與富裕社會”維度，主要從收入分配問題上作衡量。以上的研究體系在國內的研究也比較充份，研究項目的開展也比較多。（見表一）

另外，在社會轉型的過程當中，也會有相應的社會代價。這種社會代價，學者們也歸納了一套指標體系。表二是內地最近幾年比較關注的幾個指標。比如失業，失業率警戒線是10%。社會轉型中，失業率如果超過10%，就可能帶來社會不穩定的問題。第二是社會分化。10%最富有家庭的收入與10%最貧困家庭收入的比例，警戒線是10比1。貧困線以下居民的比重，10%是警戒線。最低工資與平均工資的比例是1比3。第三個是犯罪率。包括每萬人的犯罪率和每萬公務員的腐敗人數，都有一個指標。還有社會不安率的問題。包括通貨膨脹，經濟增長率，對政府的信任度，參與群體性事件的人次率，也都是內地社會面對的重大問題。還有是社會公害。包括土地荒漠化，三廢處理等。這些都是現代社會轉型會帶來的問題，這些問題怎麼衡量，它跟政治之間又有什麼關係，這些都是可以測量和可以評價的。

表一，社會轉型的主要向度、指標與轉型度

社會轉型向度	指 標	轉型度		
		I	II	III
計劃社會 — 市場社會	商品市場定價率	10-50%	50-90%	90%以上
	勞動力市場定價率	10-50%	50-80%	80%以上
	政府審批項目減少率	10-50%	50-70%	70%以上
	股份制企業比例	10-50%	50-80%	80%以上
	立法公開聽證率	10-50%	50-80%	80%以上
	幹部任用票決率	10-50%	50-80%	80%以上
農村社會 — 城市社會	農業增加值比重	50-30%	30-15%	15%以下
	農業勞動力比重	70-50%	50-20%	20%以下
	城市化率	20-40%	40-70%	70%以上
	第三產業就業率	10-30%	30-60%	60%以上
	服務業增加值比重	10-30%	30-50%	50%以上
工業社會 — 信息社會	中學普及率	20-50%	50-80%	80%以上
	大學普及率	5-10%	10-30%	30%以上
	每千人醫生數	1	2	3
	每百人電視機台數	10-30	30-50	50以上
	每百人互聯網用戶	1-20	20-50	50以上
貧困社會 — 富裕社會	人均GNP (千美元)	1-3	3-6	6-9
	恩格爾系數	50-40%	40-30%	30%以下
	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4000-8000	8000-12000	12000以上
	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 (元)	2000-5000	5000-9000	9000以上
	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 (平方米)	10-20	20-40	40以上
	農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積 (平方米)	10-20	20-40	40以上
	百戶小汽車擁有量	1-20	20-50	50以上
	三廢處理率	30-50%	50-80%	80%以上



表二，社會轉型代價的指標體系表

轉型代價	預警指標	警戒線
失業	失業率	10%
	平均失業時間	6個月
社會分化	10%最富有家庭的收入與10%最貧困家庭收入之比	10:1
	貧困線下居民的比重	10%
	最低工資與平均工資之比	1:3
犯罪	每萬人中犯罪人數	200
	每萬公務人員中腐敗人數	100
社會穩定	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率之比	0.8:1
	對政府的信任度	50%
社會公害	參與群體性突發事件人次率	10%
	荒漠化土地治理率	50%
	三廢處理率	80%

現在說說關於政治文化。學者們對政治文化下了一個定義：政治文化是一個地區，或者是一個國家的社會成員、公民，對於他所在的這個政治體系以及個人所承擔的政治角色的認知、態度、能力，包括情感。簡單說，政治文化就是跟政治有關的文化。就是說，我們在一個國家生活，我們對國家怎麼看待，我們對政治體系怎麼看待，我們對個人在政治體制中的能力是怎麼看待等等，這都是政治文化的問題。

政治文化這個概念，最早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由美國政治學學者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和弗巴（Sidney Verba）提出來的。他們強調對整個政治關係的認知、情感和態度問題。我個人認為，政治的核心是權力的問題，由權力可以派生出利益和權利。台灣學者胡佛先生也就政治文化提出了很好的意見，他說：“政治文化的理論架構，應該以權力的心理取向為中心概念。”我是比較同意這個觀點。因此，我認為政治文化主要關注的是民眾對國家、民族的認知與

態度；民眾對權力主體，包括政府、政黨的認知與態度；民眾對權力結構的認知與態度。我們社會中有很多權力結構，比如說政府和政黨之間的關係，政黨和民眾、社團之間的關係，這都是結構上的問題；民眾對權力運行模式的認知與態度，這涉及民主參與的問題；民眾對權力運行結果的態度，也就是對政府政策推出的結果的態度……這些都是當代中國政治文化方面的重要因素。

在政治文化的語境下，這些認知與態度構成了公民文化的素質。政治文化的建設，最重要的是對民眾進行公民教育和民主政治教育。

社會轉型與政治文化是有著連動關係的，這種連動關係包括：社會轉型中政治體系的調整、權力的轉移與分配變化，導致國民對政治體系認知、立場、情感、態度以及信仰的調整；社會轉型中利益、權力和權利關係的調整，導致國民政治參與、政治行為方式的調整。因為利益的調整會有公平和不公平的問題；還有政府與民眾關係的變化。政府是操控著權力，而民眾有著其權利，當中便涉及了權力與權利之間的關係。

二．現實：中國社會轉型的現狀

首先，我們中國正處於持續性的社會轉型，實際上我們兩岸三地都在進行著社會轉型。第一個轉型的標誌是社會體制的改變，特別是中國大陸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第二是社會結構的變化，社會結構在社會學裡很多指標，政治學的也差不多，如人口結構，現在關注的是老年化的到來；還有的是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結構問題，我們每年有多少農業人口轉移到非農業，有多少農民工走到城市；對產業方面，對城市生態方面的影響是什麼，這些都與人口結構有關；還有是文化深層結構的變化。文化改革是一方面，開放是另一方面，開放以後對民眾有什麼影響；還有就是社會生產方面，特別是社會生產消費和分配的所有制方面，現在我們從法律上承認多種所有制，特別是對個人財產上的認可；還有分配



結構的變化。分配結構實際上導致階層變化，在中國，現在不用階級這個詞作表述，但階層的表現還是非常明顯的。這些都是中國社會轉型的標誌、標示。

在社會轉型的過程當中，內地曾經提出過“新四化”和“老四化”。老四化指的是實現四個現代化，即工業、農業、科技和國防現代化。現在新的四化，指的是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和全球化。

工業化。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它是指消費結構升級帶動工業結構的變化。去年我們重工業佔工業增加值的比重是67%，即中國已進入重工業化發展的階段。

城鎮化。中國的城鎮化，目前正以每年約一個百分點的速度快速增長。1990年是18.9%的城鎮化率，目前已達到40%以上。

市場化。目前中國民間資本已超過15萬億元，由於民間資本擁有率增多以後，影響了市場的變化。原來是以政府主導，現在由市場作主導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全球化。我們入世以來，過渡期已接近尾聲，經濟全球化速度日益迅猛。還有我們的外貿依存度已從改革開放初的35%提高到2005年的60%，增長率非常之快。

還有學者認為，在未來的50年，中國還要經過兩次大的社會轉型。一個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型；一個是從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從城市社會向城鄉動態平衡社會轉型。

再次強調，中國的社會轉型採取的是漸進式的轉型模式。儘管是漸進式，但仍帶來一些嚴重的問題，到現時為止仍不能忽視。這包括上述提及的“新四化”所引發的問題。比如工業化問題。進入重化工業發展階段，對資源和環境的承受能力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城鎮化問題。大規模拆遷徵地，農村人口湧入城市問題，中國城鎮化正在加速，拆建要考慮到群眾利益和承受能力；市場化問題。市場化因素增強，如何避免市場的盲目性，考驗宏觀調控的能力；全球化問題。在

日益迅猛的經濟全球化中，保護自己、穩定自己，是個不能忽視的大問題。

面對社會轉型，當前政府首先考慮的是社會政治穩定問題，這是非常明確的。如果沒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發展是談不上的。當然，沒有發展不會有真正的穩定。改革開放與穩定的關係在內地已經討論了很多，也達成一些共識。關於影響穩定的幾個因素，現在大家最集中的是在以下三個方面：一、轉型導致社會不公正的結構再造；二、日益明顯的相對剝奪感與階層認識；三、民眾利益表達途徑的梗阻。美國學者亨廷頓教授關於社會轉型與政治穩定的研究提出一個公式（見圖一），我認為這個公式可供我們參考。他指出，如果社會比較穩定，不發生動亂，則民眾政治參與的水平就要盡量降低，而政治制度化和法治化則要提高。但政治參與率和參與水平又不是我們所能操控；社會成員的挫折感和社會流動機會也是需關注的。在內地，社會成員對社會出了問題會有不滿（這在每個社會都有），但社會流動機會的問題在內地則比較突出，這包括空間上的流動、行業上的流動、時間上的流動。

圖一，社會轉型與政治穩定的關係

$$\frac{\text{社會動員}}{\text{經濟發展}} = \frac{\text{社會成員挫折}}{\text{社會流動成本}} = \frac{\text{政治參與水平}}{\text{政治制度化}} = \text{社會動亂}$$

中央在決策上，對政治穩定和社會改革的考慮同樣重視。據我們的理解，在解決經濟轉型中的問題，特別是經濟問題時，我們提出科學發展觀，可持續發展觀；解決社會轉型中的問題，提出構建和諧社會以創造穩定環境；在政治上，提出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建設提高的問題。而核心是在全社會提出一個價值取向問題——以人為本。這是從理論上建立起一個相對完整的概念。

但是在目前這個階段，中央正致力解決五個重點問題：一、城鄉差距；二、地區差距；三、貧富差距；四、社會不公；五、社會矛盾。中國近期出台的西部



大開發，振興東北，中部崛起等，實際上也都可以理解是從政治上解決城鄉和地區差距的問題。另外，在解決貧富差距方面，比如現在國內正開展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有一個詞叫“削峰托低”。削峰，是把某些行業、某些單位太高的工資水平適當降下來；托低，就是要有最低的一個保障。目的就是防止差距過分拉大。

三．內地社會轉型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反映

第一個變化，是改革開放使我們的政治文化發展視角從封閉型向開放型轉變。這一點，首先是我們上層政治文化的轉變。2000年8月，江澤民先生在接受美國記者麥克·華萊士採訪時說：“我們要學習所有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包括科學技術、經濟的經驗。”這顯示在上層方面有相當程度政治文化的轉變。在政治層面上，中央也不斷說明“堅定改革”和“堅定開放”。另一方面，社會大眾也借鑒和吸收外來的影響，開始由封閉走向開放。

第二個變化，是政治人格由盲目依附型向獨立自主型轉變。因為計劃經濟是談不上獨立人格的，但市場經濟就是要調動經濟個體的主體意識、競爭意識、自由精神、寬容精神、平等觀念、妥協思維。具體表現在權利認識增強、身份認同感增強、政治參與認識增強。這些意識和精神滲透到政治領域，形成獨立政治人格和新型政治文化。在價值取向方面，我們在個體與集體之間也在進行調整。關於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在內地是一個意識型態的話題，也是價值取向的問題，現在也出現了轉變。我們曾經堅決的反對個人主義，鼓勵集體主義。特別是涉及到社會架構和分配的時候，我們會強調先集體後個人，在各種公共政策上都有這種體現。但最近這些年，內地已有了很大的變化。

還有就是民主意識和公民意識的增強。民主建設在內地現在絕不是一個避諱的話題，我們的建國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民主、繁榮、強大、強盛的國家。但是

在民主建設上，我們是要有序地推進，由基層做起。幾年前的兩會期間，曾有記者向朱鎔基總理發問，中國國家的領導人何時能實現直選。總理回答是希望越快越好。這說明我們並不害怕直選。中國現在也已經在鄉鎮一級進行領導人直選。民主認識和公民認識還包括平等、自由與多元、政治教育方式改變等問題。

以上都是政治文化上的積極變化。但我們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信仰問題還沒有過去。

信仰危機是指：“公民對政治認同、政治體系發展和方向的集體迷失。”它對政治體系、社會制度、社會發展方向都沒有共同的認同。這方面，政府是高度重視，也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故也存在一個政治信仰和政治理想危機與重建的問題。

中國歷史上有過三次大的信仰危機，包括：第一次重大的信仰危機是出現在大約兩千年前，周朝的沒落和春秋戰國時期，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禮崩樂壞”的社會轉型期；第二次重大的信仰危機是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即在封建皇朝面臨崩潰時期出現的一次反帝愛國運動，進而引發的打倒孔家店，否定傳統文化的新文化運動；第三次重大的信仰危機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我們認為這個信仰危機還沒有過去。

主導政治文化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進行政治文化整合，力圖重建政治信仰與政治理想。例如，這些年從鄧小平先生的“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了根本”；江澤民先生的“旗幟問題至關重要，要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三個代表”的黨建理論；胡錦濤先生的“科學發展觀”的大力宣傳，等等。但同時，我們也比較現實的，認可在初級社會階段，民眾的信仰是可以分層級的，比如，愛國是第一層，民眾的思想只要愛國就行；第二層是擁護國家統一和贊同社會主義，第三才是共產黨黨員的信仰。



另外，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國家認同和民族主義的問題。經濟發展促使國家強盛，但經濟發展會帶來民族主義，而極端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是有問題的，會帶來外部的衝突和內部的不穩定。

還有全球化和政治文化的問題。我個人理解，全球化主要是經濟方面的，內地從經濟上肯定全球化。外國反全球化的聲音非常之大，但內地認為這是一個機遇。但經濟的變化會導致文化的變化，文化的變化卻與全球化的路徑不同，受到傳統的抵制。在迅速全球化的過程當中，我們的文化觀改變，傳統觀丟失，帶來一系列民眾心理、社會認同、國家認同等政治文化的問題。所以堅持傳統與實現現代化之間就存在著爭論和矛盾，有著路徑選擇的問題。例如全球化是否便是西方化、美國化？，全球化有沒有本土化？等等問題。故此，中國官方提出了堅持中國特色的全球化。

綜上，我的簡單結論是，中國的社會轉型還沒有完成，政治文化的重構也剛剛開始；民主法制是建設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必須包括政治文化的現代化。

四．關於澳門政治文化的一點感言

首先，從政治文化的角度來說，澳門的民眾基礎是非常好的，特別是跟香港、台灣等其它地區比較。愛國愛澳、中華文化的光榮傳統是澳門的民眾基礎；其次，澳門的政治體系是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行政主導；其三，在政治實踐方面，政府務實、各界努力、社會安定、政通人和；最後，在政治文化方面，有中西合璧、文化包容、社團作用。談到社團，澳門的特點是社團沒有政黨化，而社團沒有政黨化，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研究課題。

對於澳門政治文化的情況，我認為仍是處於持續的整體開放和社會轉型過程中。而當前面對的首要問題是行政和法律改革。這說法，在澳門特區政府二零

零七經濟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也有提到。而行政和法律改革可能遇到以下三個問題：一、社會整體開放與外來政治思想的衝擊，這是體制選擇的問題，如選擇什麼樣的政治體制、經濟發展體制、社會架構體制等；二、產業結構變化帶來傳統社會結構的解體；三、經濟的轉型帶來傳統文化的斷裂。

澳門的情況，給我們帶來的思考是如何大力建設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政治文化。我認為，建立“一國兩制”下的特殊政治體制並保證其高效運轉，是亟待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文化來提供強有力的支撐。根據澳門已有經驗，弘揚基本法精神，大力宣傳推廣基本法，這是建設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政治文化的最主要內容。當中有幾個要點：一、在“一國兩制”中，“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二、“澳人治澳”，必須堅持以愛國者為主體；三、“依法施政”，不僅是要按基本法條文施政，更要按基本法的精神施政；四、發展澳門“一國兩制”下的新型民主必須循序漸進。

最後，我認為保護澳門的特色文化，使之成為凝聚不同國籍、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澳門居民的重要精神力量，賦予澳門中西合璧特色文化以新的內涵，成為與“一國兩制”政治體制相適應的愛國愛澳文化的組成部份，這都是澳門政治文化建設的應有之義和主要內涵。



港澳管治問題研究*

郭敬文

香港、澳門於1997年及1999年先後回歸祖國，兩個特區由歷史背景到社會經濟結構和規模及文化背景等都有著不少的差異，但兩特區均實行著「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開創性構思，是史無前例。

一如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所言“香港回歸祖國十年以來，「一國兩制」已由一個未經實踐的概念，變成活生生的事實。一如眾望，我們貫徹了「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而中央政府亦一直堅守這個承諾。在《基本法》的保障下，我們的自由與生活方式，我們的司法、社會及經濟制度，依然是我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份。憑著一股「香港定能做到」的精神，香港繼續欣欣向榮。我們在加強與祖國連繫的同時，保持著作為亞洲的國際金融、貿易、物流與旅遊中心的地位。”

現時港澳經濟發展一片好景，香港整體稅收創歷史新高達到1,551億港元（香港稅務局公佈2006/2007年度稅收），而澳門的博彩稅收更達558億澳門元（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公佈2006年度第一至第四季）。「自由行」令港澳旅遊業在2006年創下歷史新高，訪港旅客超過2,500萬人次（香港旅遊事務局公佈），而訪澳旅客超過2,199萬人次（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公佈）。

由以上的數據可以反映，港澳現時確實是經濟達到前所未有的好景，香港恆生指數屢創新高，2007年初已超過20,000點，但經濟的高速發展又是否意味著另一次的經濟泡沫的來臨？香港的「七．一」遊行、澳門的「五．一」遊行、香港的政制問題、澳門在賭權開放外資湧入下令經濟急速發展所衍生的各種問題、民

* 於2007年6月15-17日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主辦“香港回歸十周年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表論文。

眾對政府的不滿甚至被反政府勢力演化成政治層面，影響政府的管治效能，港澳兩地經濟發展背後又是否存有隱憂？

本文試由港澳過渡期開始，以經濟及政治層面入手，探討港澳特區成立以來的部份管治問題，作為人們對特區管治的問題作深層次思考的引子。由於本人水平有限，所寫內容難免有所偏頗及錯漏，還請多多指正。

一．香港後過渡期的經濟及政治格局

1. 回歸前的港英政府大派福利

港英政府在回歸前部署「光榮撤退」所遺留下來的問題，在財政政策上，通過提高公務員薪酬、提高社會福利、減稅收、增加公共開支等方式，使香港進入了一個「派糖」的時期，令市民對港英管治留下美好的回憶，但同時形成日後香港特區政府公共開支膨脹，財政儲備耗減的被動局面。

在彭定康就任港督前半段時間裡，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基本在14.6%~16.3%，到回歸前夕的1996/1997年度的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18%，公共開支增長率超過生產總值的2.9%，背離了香港長期奉行的公共開支增長率要與生產總值增長率相適應的公共行政管理原則。更為嚴重的是，關於公務員薪酬和社會福利等開支大幅提高的問題。本來，由於香港的低稅率政策，香港公務員薪酬收入和福利待遇在全球都已算處於發達國家的前列，但港英政府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方面大幅增加公務員薪酬和福利開支（見表1.1），另一方面又大幅寬減薪酬稅，大派「免費午餐」而減少財政收入。



表1.1 香港政府經營開支概況(1985/1986年度~1995/1996年度)

項目	1985 /1986 實支	1986 /1987 實支	1987 /1988 實支	1988 /1989 實支	1989 /1990 實支	1990 /1991 實支	1991 /1992 實支	1992 /1993 實支	1993 /1994 實支	1994 /1995 實支	1995 /1996 實支
薪俸	109.6	121.84	135.00	158.28	188.55	234.43	252.86	258.52	287.02	320.77	348.32
與職員有關的支出	11.83	13.60	14.96	16.18	18.03	23.96	31.83	32.75	34.10	35.79	38.11
退休金	12.26	12.90	13.50	16.04	19.49	25.41	34.01	44.36	52.85	62.56	74.93
部門支出	29.07	31.59	35.57	36.67	38.50	34.52	47.82	44.38	49.10	55.63	61.99
其他費用	48.38	51.57	55.45	66.32	84.02	97.12	109.39	117.70	139.04	156.33	179.28
教育	42.28	48.83	53.49	60.75	70.76	87.37	97.28	109.21	122.95	138.59	156.32
醫療	10.60	12.19	13.42	14.96	17.90	22.74	54.52	111.81	132.52	155.46	183.70
社會福利	4.48	5.04	6.37	7.76	9.84	12.54	15.87	18.24	20.27	22.74	27.38
大學及理工	15.62	17.99	19.57	23.08	27.64	34.00	43.57	56.14	68.26	85.50	93.85
職業訓練局	2.60	3.35	4.03	4.62	5.42	4.06	8.14	9.01	10.97	12.79	14.97
雜項	4.91	5.33	5.93	7.94	10.32	13.63	12.44	13.81	14.83	19.01	23.99
其他經常開支	6.19	12.8	15.90	7.75	10.29	10.91	9.04	34.31	37.67	5.98	16.19
經營開支總額	297.85	337.04	363.19	420.35	501.06	614.69	716.77	850.24	969.58	1,066.20	1,219.03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歷年年報

從表1.1和1.2可看出：公務員開支在11個財政年度內每年都有大幅度的增長，十年內年均增長13.23%，其中薪俸年均增長12.27%，與職員有關的支出年均增長12.64%，退休金年均增長20.01%。公務員開支佔政府一般收入賬目開支的比重，前七年均超過40%。後四年均低於40%。而補助金開支佔政府一般收入賬目的比重則持續走高，前六年補助金佔比重低於30%，後5年均高於30%，1995 1996年度更高達40.31%。十年內，補助金開支平均年增長20.07%，高於同期經營開支總額年增15.22%，香港政府一般收入賬目開支年增15%、香港政府開支年增14.79%等指標¹。

1 跨越九七的香港財政-周維平、韓繼東p.48海天出版社1997年版

表1.2 公務員開支及補助金開支增長情況(1985/1986年度~1995/1996年度)

項目	1985 /1986	1986 /1987	1987 /1988	1988 /1989	1989 /1990	1990 /1991	1991 /1992	1992 /1993	1993 /1994	1994 /1995	1995 /1996
薪俸	109.6	121.84	135.00	158.28	188.55	234.43	252.86	258.52	287.02	320.77	348.32
公務員開支*	133.72	148.34	163.46	190.50	226.07	283.80	318.70	335.63	373.97	419.12	461.36
補助金開支	80.19	92.73	102.81	119.81	142.18	177.34	231.82	318.22	369.80	429.09	500.21
公務員開支佔一般 收入賬目開支%	43.49	43.85	43.68	44.67	43.51	45.32	43.75	38.81	37.95	38.75	37.09
補助金開支佔一般 收入賬目開支%	26.31	27.41	27.47	27.93	27.36	28.32	31.82	36.79	37.53	39.67	40.21

*公務員開支包括：薪俸與職員有關支出和退休金

補助金開支包括：教育、醫療、社會社利、大學及理工、職業訓練局及雜項補助

資料來源：跨越九七的香港財政-周維平、韓繼東p.48海天出版社 1997年版

其中補助金中，到1995~1996年度，教育開支是十年前的近四倍，醫療開支是十年前的十七倍多，社會福利開支是十年前的六倍多。不僅大幅增加這種剛性的經常開支，更對香港重要的稅種薪俸稅進行大幅寬減。彭定康在最後的一份施政報告《過渡中的香港》提到「暢談」他在香港五年的「政績」時說：自1992年以來，將基本免稅額及已婚人士的免稅額提高44%；將第一名子女免稅額提高16%；將第二名子女免稅額提高56%，將供養父母的基本免稅額及額外免稅額，分別提高33%及71%，以及單親免稅額提高44%。按照他的說法「一個中位數入息的家庭，如有兩名子女，根本無須繳納薪俸稅」。因此，在香港「工作中人口60%根本無須繳納薪俸稅，而按15%這個不算重的最高稅率繳稅的人，也只有2%」²，彭定康的這種大派「免費午餐」的做法，將香港未來特區政府推到一個非常尷尬、非常被動的局面：不減薪酬、不減福利、財政將難以為繼；若減薪酬減福利，將直接激化社會矛盾，引發公務員、醫療、衛生界和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不滿。這已為香港特區政府埋下了「財赤」的種子。³

2 過渡中的香港-彭定康 p.7(1996.10.2)

3 回歸十年的香港經濟-郭國燦著p.108~110三聯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4月版



2. 回歸前的港英政府從本質上改變香港的政治制度為特區政府管治加入難題

在1992年至1997年，前港督彭定康在其管治期間加快了民主步伐。於是，當香港的主權在1997年回歸中國時，香港已經轉化為一個「半民主」的政體，擁有一個雄心勃勃、向地區或功能組別選民負責的民選立法機關；並有一個主要經委任而來的行政機關，但其公信力薄弱得多，而且在立法機關沒有鐵票或任何隸屬的政黨。自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中國一直都密切留意著，英國政府會否在1997年時將財政健全、政治和社會易於管治的香港交還中國；抑或會暗在香港引入激進的改革，耗盡香港的庫房、損害香港的經濟優勢，並從本質上改變香港的政治制度。彭定康先生的建議，明顯地企圖盡最大幅度徹底地改變香港的政治架構；加上沒有事先諮詢中國，從而令中方嚴重質疑英方的誠信，即她是否信守一貫以來就引入轉變時在具體內容和程序上的協議。在中國的要求下，英方於1993年4月起就彭定康先生的方案與中方展開了諮詢。

中英雙方政府進行了十七輪諮詢後仍然無法達成協議，諮詢亦於1993年11月告終。隨後，香港政府迅速地於同年12月15日向立法局提交立法草案，廢除立法局的官守和委任議席，並顯著增加民選席位。二十位直選議員將產生自地區選舉，三十位產生自選民範圍被大為擴大的功能界別，十位產生自由區議員組成的選舉委員會，而有關的區議員將於1994年9月透過投票選出。必要的立法於1994年6月30日獲立法局通過。

有鑑於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1994年8月31日通過了一項決定，指出立法局及兩個地方議會最後一屆任期將於1997年6月30日屆滿；同時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權力，安排成立一個任期有限的特別行政區臨時立法會（下稱臨立會）。臨立會於1996年12月正式成立，一直在與香港為鄰的深圳經濟特區開會，最後一次會議於1998年4月在香港舉行。中方這項決定，打消了不少人對於最後一屆立法局議員可坐「直通車」的希望。他們

將要先下車然後再上車，惟部份議員在臨立會解散並於1998年5月立法局重選後未能重返立法局。⁴

港英政府於回歸前在改制上的改動為以後的香港特區政府管治上埋下了許多政制問題。

二．澳門後過渡期的經濟及政治格局

1. 財政散盡 治安惡化

在澳門回歸到中國之前，葡國政府早已將歷年來的財政滾存幾近散盡。儘管葡國政府沒有留下債務，但是也沒有財政儲備留存，只剩下一筆80億土地資金留給澳門特區政府，使特區政府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

澳門在回歸前澳葡管治末期，黑幫基於利益紛爭互相仇殺，連政府官員也被當街槍殺。治安不靖是澳門後過渡期最大的問題。

2. 「三化」問題嚴重滯後

為確保澳門政權順利交接，中葡雙方協議在澳門過渡期續步推行中文合法化、公務員本地化和法律本地化，合稱「三化」工作。但澳門回歸前「三化」工作未能有效落實，為澳門將來的特區管治留下不少難題。

中文官方地位：在被葡萄牙統治時期，葡文一直是澳門的官方語言，反觀中文，卻一直沒有官方地位。對於主要為華人居民的澳門，這是不利居民和不利經濟發展的障礙。當時中國外長錢其琛在1992年訪問葡萄牙時，兩國就此不利障礙達成協定，從此中文取得了官方地位，與葡文並列成為澳門的官方語言。儘管如此，澳門總督在1999年12月19日才發佈批示，把中文正式列為澳門地區的官方語言之一。

⁴ 跨越九七的香港財政—周維平、韓繼東p.48海天出版社1997年版



公務員本地化：因葡文是澳門的官方語言，回歸前的澳葡政府主要文件均為葡文，形成要進入公職必定以葡萄牙人和土生葡人為主；華人公務員，只佔少數且多為低職級。為此，澳葡政府在《中葡聯合聲明》簽署後，開始分階段、較有秩序地培養本地公務員，具體措施包括與葡萄牙國家行政學院合作，在澳門東亞大學開設公共行政課程、舉辦「赴葡就讀計劃」和「赴京就讀計劃」，以及設立「司長助理」一職等。但公務員本地化的進度一直相當緩慢。而葡方堅持政務司級官員不作本地化，雖然表面上不利於整個行政架構的順利運作和交接，但這反而有利新任特首的籌組領導班子，有利於行政主導的管治。

法律本地化：澳葡時期的法律全都是葡文而且繁瑣，由於受到語言文字及澳門一直所沿用來自葡國的「歐陸式典章成文法」及少量的「普通法」的影響，這些法律有一些是直接從葡國制訂，延伸至澳門適用的葡國全國性法律。因此，在過渡期內，需要將這些法律加以修訂，成為政權移交後適用於澳門的法律。

司法人員本地化也是法律本地化的另外一項主要工作。澳門政府成立「法律翻譯辦公室」，開始對澳門的主要法律進行中譯工作，並於1996至1999年期間，分別頒佈構成澳門法律體系的五大框架法典，即《刑法典》、《刑事訴訟法典》、《民法典》、《民事訴訟法典》和《商法典》。另外，又在澳門大學開設法律系，於1995年又成立「司法官培訓中心」，培養本地法律人才，但由於法律人材培養並非短期內可以達到，因此，在澳門特區成立後法律的滯後也為特區的順利施政帶來不少障礙。

三．港澳回歸首份施政報告體現出兩地的管治方向的明顯差異

港澳回歸前的經濟政治情況可從由以上的背景資料中可以看到有著明顯的差異，兩地特區政府在管治上也面對著不同的問題，由兩個特區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中可以看到兩地的管治理念分別：

1. 香港特區成立首份施政報告繪畫出香港特區的美好宏圖

香港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向臨時立法會發表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的其中一些主要重點：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其最大的任務是要造福於民……我們擁有了無與倫比的優越條件：我們擁有一國兩制賦予的高度自治；擁有豐厚的財政儲備；擁有運作暢順的社會和經濟體系；擁有完整的法治體系；擁有位於祖國南大門的地理位置；擁有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擁有國家高速發展的強盛背景。

在解決香港居民的居住問題上，提出增加土地供應和興建輔助的基建設施，以確保達到每年最少興建85,000個公私營單位的目標。在未來十年出售250,000個公屋單位予租戶，以及讓成功申請到租住公屋的人士選擇購買居屋單位。成立一項新的置業貸款計劃，每年幫助6,000個家庭自置居所。在未來五年，這項計劃會為每個合資格的家庭提供約60萬元貸款。增加售予及租予公屋輪候申請人的公屋單位數目，以期在2005年年底以前，實現把輪候時間縮短至3年的目標。

在教育上，成立50億元的優質教育發展基金，為推行嶄新的教育計劃提供經費。為中學多提供700名以英語為母語的教師。檢討教育架構、課程和考試制度。

在照顧老人方面，增加老人的每月綜援金額，增幅為380元。透過「買位計劃」，增設2,400個資助院舍宿位。在1998至2002年期間，增設23間老人中心。

改善培訓工人計劃，改革各項培訓和再培訓計劃，令課程更能迎合市場的需求。又開辦新課程，使工人能應付未來工業所需。為建造業和紡織及製衣業的技工提供培訓。躍進資訊新紀元，建設香港的資訊基礎設施。由一個決策局負責資訊科技方面的政策事宜。推行為期5年的資訊科技教育策略，以提高教與學的成效。



工商業發展向服務業支援資助計劃注資5,000萬元，以改善服務業。興建科學園、第二所工業科技中心和第四個工業園。向香港旅遊協會撥款一億元，成立一個國際盛事基金，協助推廣旅遊業。設立電影服務統籌科和電影服務諮詢委員會。

規劃建設，愛護環境，在基礎建設和環境規劃方面，與內地機構加強合作。在1998年開始推行減少廢物計劃，並就二十一世紀的持續發展議程，徵詢公眾人士的意見。

醫療護理，在1998年進行醫療體系檢討。新的九龍灣基層健康護理中心及護養院會在1998年投入服務。制定立法架構，以承認及規管中醫師的執業。在1998年增設754張醫院病床。

新來港的人士，民政事務局局長負責統籌各項服務。在2001至2002年度之前，多建6所小學和19所中學。實施校本計劃，協助新來港的兒童。繼續提供職業培訓和再培訓，以及提供協助新來港人士就業的服務。

公共行政，公務員隊伍會引入以目標為本的管理程序，以改善服務。在1998年5月24日舉行立法會選舉。檢討兩個市政局和各區議會的架構。

保持社會穩定的基礎，繼續奉行法治和獨立的司法制度。維持低稅率及穩健明確的稅制，自由市場，以及高效率、奉行精兵簡政及不干預原則的行政機關。警隊和廉政專員公署會繼續獲得支援，改善專業訓練和效率，以打擊罪行和貪污。⁵

由以上的施政理念可以看到香港在回歸時，表面上經濟一片繁榮，而董特首所繪畫的香港美好宏圖也著實令人有一種「香港明天會更好」的良好感覺。

5 1997年度香港行政長官施政報告

2. 澳門特區成立的首份施政報告

反觀澳門特區首屆行政長官何厚鏵於上任後所發表的首份施政報告，當時澳門所面對的問題是多麼嚴峻，由報告中可以看到務實之外更令人感到有一點如履薄冰的感覺，以下是澳門特首何厚鏵首份施政報告的一些重點：

針對澳門社會的歷史和現狀，我們指出，在特區初期，必須以「固本培元，穩健發展」為政府整體政策的基本目標。這個目標不但構成本年度施政報告的主題，在未來幾年，它依然是特區政府和全體市民共同努力的主要方向。

「固本培元，穩健發展」的戰略含義，就是用固本培元來奠定穩健發展的基礎。與此同時，兩者緊密互動，根基促成發展，發展鞏固根基。根基初步穩固的局部領域，將率先走出發展的第一步，逐漸形成全局的改觀。

我們提出這個目標的理由在於：第一，特區政府現有的財政力量，不允許我們在近期之內開展那種全新的、大規模的基建性工作計劃。第二，經過一個起伏較大的發展階段之後，澳門需要時間積累能量，恢復元氣，重新確定前進的起點。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將不足的條件加以完備，使社會獲得均衡發展的基礎，在此之前，適宜採取按部就班的施政策略。第三，澳門剛剛進入「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的特區新時期，在社會心態、政治思維和管治理念等方面，都需要有所調整和適應，重新凝聚我們的意志和力量去創造澳門的未來。

當「固本培元，穩健發展」的基本目標被確立以後，我們必須從現存的有利條件中找出切入點，透過公共行政的實踐和探索，並藉著政府與民間的合作互動，腳踏實地地實現此一基本目標。

按部就班，務實施政

1. 改善投資環境，加促經濟復甦
2. 整頓治安，維護法紀



3. 肅貪倡廉
4. 鞏固法律體系，加強行政和立法的合作
5. 維護司法獨立
6. 完善架構，提高效率
7. 強調社會責任感，促進行政現代化
8. 加強審計，善用公帑
9. 完善醫療系統，保障市民健康
10. 培育世紀人才，建設美好明天
11. 充份利用福利資源，回應市民實際需要
12. 妥善處理來澳人士定居問題，確保居民整體生活質素
13. 發揮獨特優勢，擴大旅遊效益
14. 保護歷史特質，提升文化氣息
15. 發展大眾體育，強健市民體魄
16. 發揮傳媒功能，推動社會進步⁶

四．回歸初期香港經濟危機重重

1. 成功捍衛港元聯繫匯率

當香港人還沉醉於九七回歸效應帶來的財富急劇增長的繁華夢境時，一場由泰國引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已悄然而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對香港的衝擊主要在港元聯繫匯率制度的衝擊，香港特區政府成功擊退國際炒家，捍衛了聯繫匯率，確保了香港金融市場和經濟的穩定。

香港特區政府動用財政儲備，以相當於當時港股總市值的10%的金額，投入1,200億港元買入基本上是優質的33種恆生指數成份股（藍籌股），將恆生指數

6 2000年度澳門行政長官施政報告

推高1,200點，擊潰了投機者的「雙重操縱」，到1998年香港特區政府宣佈成立外匯基金投資公司，管理這批「官股」資產，在1999年6月，外匯基金公司決定將「官股」以單位信托基金形式分批出售，並命名為「盈富基金」，在港元聯繫匯率的保衛戰上的成功，香港特區政府作出的果斷決策並建立了勇於負責的形象，為香港特區政府帶來了豐厚的收入，按1999年10月25~11月4日次公開發售，市場反應熱烈，認購額達483億港元，香港特區政府獲利近200億港元，加強了香港市民對新成立的特區政府管治能力的信心。⁷

2. 回歸後的兩次經濟衰退對港人影響深遠

香港特區經濟生產經過亞洲金融危機後出現了自1961年以來的最大跌幅達5.5%，是香港回歸的第一次經濟衰退。到1999~2000年香港經濟出現了第一次的恢復性增長，2000年的經濟實質增長10%，是1987年來最大的升幅。

但由於受到亞洲金融危機後衝擊，樓市泡沫爆破，科網股爆破。美日經濟低迷，遂影響香港的出口貿易，在外部需求疲弱，內部需求減緩，再加上美國“九·一一”的世界性影響，香港經濟又陷入第二次衰退。香港經濟出現通縮，失業高企，財赤嚴重等一系列問題陸續浮現，加2003年SARS的侵襲，使香港經濟處於一種不景的狀態中。

由於樓市泡沫爆破，香港出現了許多的「負資產」人士，「負資產」的影響之大可使許多人士及家庭上負了沉重的債務，嚴重者物業被沒收拍賣甚至走上破產之路。曾有人說「負資產階級」的狀況遠比「無產階級」慘況嚴重，因為「無產一身輕」，但是「負資產」者卻是賺錢為銀行打工，可能是「窮半生的努力來置業安居，卻換來恐怕下半生也還不完的債務」⁸。嚴重的出現「斷供」，更嚴重的是破產。香港的破產個案數字由1998年的893宗至2002年上升到25,328

7 回歸十年的香港經濟-郭國燦著p.82三聯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4月版

8 銀行減息拯救市民，香港經濟日報，1998年5月26日，中產階級心聲專欄



宗，在申請破產的人士中，有不少屬負資產業主，他們通常已失業一段日子，在山窮水盡下才申請破產。⁹

在最嚴重的2003年上半年，在「負資產」陰影下生活的人口估計佔全港人口的19%，這個問題不解決，將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會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政治問題。有見及此，香港特區政府為緩解「負資產」的情況，相繼透過香港按揭證公司、銀行推出了一些緩解措施，包括延長「負資產」人士的按揭供款期限，推出資產按揭保險計劃。¹⁰

香港特區政府在回歸後除了面對以上的問題外，更要面對嚴重的財赤問題及失業率高企的困局。

五．受惠於政策港澳兩地經濟復甦

1.CEPA及「自由行」令香港經濟復甦

香港在回歸後由於經濟衰退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民生問題，後更被反政府勢力演變成政治問題，香港特區政府在中央的支持下，通過CEPA和開放「自由行」計劃等新政策來促進香港經濟的快速復甦。困擾香港多年的經濟通縮、財赤、高失業和負資產等問題隨著香港的經濟復甦而消滅或舒緩。2004~2006年本地生產總值分別為4.7%、7.0%、6.5%保持持續增長。

2007年香港恆生指數超過20,000點的歷史新高，樓市走出谷底逐步恢復，貿易增長持續，尤其轉口和服務輸出，連續四年保持雙位數的增長。經濟的增長帶動失業率下降，從2003年的7.9%逐步下降至2006年的4.4%以下。持續68個月的經濟通縮和長達五年的財赤也在2004/2005財政年度結束。但由於經濟的復

9 明報，2001年10月13日

10 回歸十年的香港經濟—郭國燦著p.141 三聯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4月版

甦主要動力來自內地的政策和外部需求，香港的經濟一如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所言「深層次的問題並未徹底解決」，因此香港經濟仍然存在受外部經濟放緩的影響而放緩的隱憂。

2. 澳門經濟也受惠於政策而起飛

澳門回歸後，澳人治澳，治安明顯好轉遠勝回歸前。為促進澳門經濟的發展，澳門特區政府成立後隨即開放賭權，打破了澳門賭業數十年來的壟斷局面，澳門特區政府於2002年批出三個賭牌，其後變為「三正三副」六家博彩公司，引入外資。澳門特區在回歸後經濟發展經過了數年的「固本培元」，在2003年明確地把澳門特區經濟發展定位為「以旅遊博彩業為龍頭，以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業協調發展」的產業結構。受惠於周邊地區的禁賭政策及中央逐步開放內地居民到澳門的「自由行」，澳門2006年的來澳旅客突破2,000萬人次的歷史新高。隨著各大賭場相繼落成，旅客人數的大幅上升，使澳門稅收連續多年上升。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由2002年度的548億，跳升到2006度的1,143億澳門元歷史新高（見表1.3）。

表1.3 1998 2006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

	本地生產總值(當年價格) <百萬澳門元>	實質增長率 (%)
1998	49360	-4.6
1999	47287	-2.4
2000	48972	5.7
2001	49704	2.9
2002	54819	10.1
2003	63566	14.2
2004	82966	28.4
2005	92951	6.9
2006	114364	16.6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局網頁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indicator/c_pib_indicator.html



六．回歸後港澳管治各存隱憂

（一）香港特區政府管治困難重重

由於受到中英政制爭議影響，香港原有依賴官僚精英管治的機制瓦解，而新的管治配套又尚未確立，在這情況下，政府在施政時困難重重。

香港特區政府面臨的管治困境就是經常受制於民望起跌，不能大刀闊斧地推行有利香港長遠發展的政策。另一方面由經濟引發的民生問題未能有效解決，被反對勢力成功轉化為政治問題，自回歸後各類遊行示威及抗爭行動增多，往往對政府施政構成一定的影響，所以如何判斷、吸納及回應民意，成為特區政府面對的一大難題。各類日益加深的社會矛盾、貧富懸殊、醫療融資問題、稅基狹窄、英語水平下降，以及整體經濟未能成功轉型和提升等，都成為困擾香港特區政府管治的因素。香港特區政府推行的「高官問責制」也受到「責難」文化的影響而未能有效地推行。如何解決香港政制問題，將是香港特區政府推行良好有效管治所面對的最大難題。

（二）澳門經濟高速增長背後的隱憂

國家主席胡錦濤於澳門特區成立五周年時對澳門所講的一段話，道出了澳門回歸後管治問題上的關鍵所在「要以人為本，不斷提高政府的管治水準。“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特別行政區政府要牢固樹立為民惠民的觀念，增強為公眾服務的意識。要深入了解社情民意，急民眾之所急，想民眾之所想，積極回應民眾要求。要建立健全民主科學的決策機制，提高決策水準。要穩步推進行政和法務等領域的改革，推進施政的法制化、規範化，不斷提高施政能力。要做到勤政、廉潔、高效，為民眾提供優質服務。要繼續高度重視治安問題，依法打擊各類違法犯罪活動，維護安定的社會環境。」¹¹

11 澳門公共行政雜誌六十七期·常修為政之德(王偉)行政暨公職局2005年版

回歸後的澳門，政府部門大力推行改革，為提高行政效率，在公共部門引入ISO品質管理，提高服務素質，有些部門並通過了ISO認證，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並為市民的認同。體現了澳門特區政府努力推行「以人為本」的管治理念。但許多的政策規章有待完善，公務員的整體素質有待提高，政府部門的行政效率及管治水平仍存有較大的改善空間。

七．「一國兩制」在港澳實踐過程中的幾點思考

（一）國家認同

香港市民國家認同感加強，由於香港市民長期接受殖民教育，加上當年港英政府刻意向港人灌輸的冷戰思維，例如「香港人第一，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令不少香港人從一開始便把祖國視為洪水猛獸。還有一點值得關注的是，台灣分裂集團強調的「本土」價值觀。由於台灣與港澳同屬華人文化，故台灣本土意識對港澳滲透的負面作用是不容忽視的。是故，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全民普選等議題一直困擾著香港的發展。

要保證「一國兩制」的成功，首要是加強民眾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在這方面，目前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二）管治團隊

然而，解決了國家認同問題是否便能保證「一國兩制」的一帆風順呢？同是「一國兩制」的澳門，回歸初期，澳門市民對國家的認同及政府的支持度遠高於香港，但在經濟持續發展的大好形勢下，仍有部份市民對政府存有怨氣，管治團隊是其中一個關鍵。因為一般市民的思維是很直接的，社會民生工作做得好，市民便會支持，否則便很易動搖「一國兩制」的信心。縱觀香港的情況，回歸初期，反政府勢力曾一度受挫，香港市民對意識型態的關注程度也曾一度下降。但



由於管治團隊欠缺整體協作的思維，團隊內的不團結，公務員體系的不合作，再加上金融風暴的衝擊，為反政府勢力提供了可乘之機。比方說「八萬五」、「禽流感」、「沙士」等民生事件，由於管治團隊的處理手法，結果被反政府勢力成功轉化為政治議題，及後在港人內地子女居港權及「廿三條立法」所觸發的人大釋法和「七．一」上街遊行，這些例子都反映出因管治團隊缺乏經驗，或對有關問題萌芽初期的重視程度不足，倒頭來把本已複雜的問題更複雜化。

（三）國際政治勢力的角力場所

香港「七．一」遊行，澳門的「五．一」遊行除了顯示《基本法》賦予特區居民應有的憲制外向政府提出訴求的權利之外，無可否認地，也可成為國際間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政治勢力角力場所，從而影響特區的管治。香港或澳門的居民以及政府官員對此必須要有正確和深入的認識。隨著資訊科技的迅速發展，世界已進入資訊的年代，全球經濟一體化對港澳特區將帶來更多的挑戰與機遇，港澳由於資訊發達且高度自由，訊息爆炸，「後現代主義」的抬頭都可能成為社會不穩定的誘因，只有加強整體市民的素質、加強教育、樹立正確的國家民族觀念，減少只問「訴求」不問付出的「責難」心態，否則香港澳門回歸定必成為中國與國際間的對抗勢力的博弈場所。

（四）善用差異良性互補

由上文可以清楚看到港澳兩地確實存有各種不同性質的差異，包括在歷史背景及政制差異、文化底蘊的不同、回歸時間上的差異、經濟規模上的差異、兩地在管治模式的差異，由上述的差異可知，兩地間的許多問題的處理方法不可以直接照搬。但無可否認地，兩地間是存在著可參照性，長期以來澳門居民主要收看的都是香港的電視，甚至學校用的教科書、各類的雜誌等都來自香港，且兩地均實行「一國兩制」，以及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等明顯共性，加上地緣關係，兩地間的交通通訊等方面都十分發達，故兩地間參照性及互補性是十分明顯的。

在排除全盤照搬的前提下，澳門在公共行政改革、廉政建設、政策法規、會計制度、人力資源等方面都可借助香港的經驗及資源。這有別於「9+2」的層面，而是建立比「9+2」更進一步的合作機制，兩地政府可以創設更多規範性渠道進一步加強合作，有利雙方發展。由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對香港競爭力二十大弱點的評估中，其中幾項包括：生活開支水平高、工業電費高、科研總開支弱、商界科研人數欠佳，勞工成本高……等可以看到，製造業受制於勞工成本高，科研力量未見突出，製造業的欠競爭性，發展存困難。香港服務業舉世聞名優勢突出，可以考慮繼續加強服務業的規模和類型，澳門對這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加則顯而易見，可爭取港澳互補共建雙贏。

港澳兩地的政治模式完全不同，香港的政黨政治處於一個初生狀態（香港沒有政黨法，只有《社團條例》和《公司條例》），而澳門的社團政治已處於一種根深柢固的成熟狀態。相對來說沒有一種政治的模式是完全優勝，用英國自然科學家達爾文「適者生存論」（Charles Darwin, 1809-82）去解釋，政治模式及政治生態的發展也將由社會民眾決定，以時間差去解決「一國兩制」實踐上的問題，有著明顯可取性，可加研究運用，澳門由於回歸遲於香港兩年在此方面已獲益不少。

（五）完善政制法規，抓好教育為本

由港澳經濟狀況可看到一種有趣現象，經濟的變化影響著社會穩定，經濟衰退或經濟高速發展都同時會對社會構成不穩及不和諧，由此可知，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和諧並沒有必然的正相關，經濟的發展隨之而來將引發向政制法規的完善提出訴求，要保障社會穩定和諧，則必須要建立一套完善而合乎社情的政制法規。

其先決條件將回到社會的構成主體（人），因此要建立完善的政制法規必先要達致個人的素質的提升及具有良好的國家認同感及社會共識。但又要認識到



世上沒有一套放之四海皆通的政制法規，政制法規只有合乎國情，為廣大民眾認同，能達致社會穩定和諧發展才具生命力。

因此要達到解決兩地在政制上的隱憂，則必須要解決民眾的素質，提升港澳特區居民的國家認同感，這必須要由教育入手，但反觀現今教育比較強調的是技能教育及知識教育，相對來說對文化教育有所忽略，因而最終解決政制問題將會回到教育政策上，要把握經濟發展的好時機加速教育的發展，糾正把教育只視作民生福利工作的低層次認識，而應看作解決特區長遠穩定持續發展的核心工作。

（六）「一國兩制」意義深遠

「一國兩制」偉大構思的成功實踐，除了影響港澳特區外，其深層意義在於對全中國的發展和統一起著重要的作用，由於港澳在回歸後仍然實行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這除了明顯地最大程度上保障了港澳居民的生活方式，同時也為中國與國際間的制度上及文化意識型態上的磨合、交融、提煉，起著緩衝和平台作用，由此可見，我們對「一國兩制」的認識，必須要有全局觀念，但更要認識到這也正是「一國兩制」的生命力所在。

結語

港澳在實踐「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過程中，所面對的社會治理問題實在是錯綜複雜，絕非本文可以全面兼顧的，因此，本文嘗試從宏觀角度就某個切面的問題進行初步的分析。而在澳門的發展過程中，仍有方方面面的深層問題，例如：如何有效發揮政府和民間的優勢，各司其職，透過政府與民間的互動和互補，提升整體施政效果；外向型的澳門在外部利好因素的帶動下，經濟步入了較急速的增長期，然而，社會內部，包括許多配套政策、措施、市民素質等等，能否同步提升的問題及其應對之策；澳門在經濟急速發展下所引起的貧富差距日益擴大，能否通過提高社會福利政策去解決的問題；在經濟快速

發展的帶動下，人力資源需求加大，需要引入較大數量的外地勞動力，然而，大量外地僱員進入本地勞動力市場，將無可避免地引發其與本地工薪階層的利益衝突，要如何應對；人力資源不足又讓澳門中小企面對人力成本大幅提升的問題，有否有效的解決之道等等，這些問題的積累和深化，將可能形成社會怨氣，為澳門的整體持續發展帶來不穩定因素，極需及早關注和探討。然而，由於篇幅和時間所限，本文未能涉及，將留待另文再行分享。



外來勞工與澳門人力資源

— 淺析澳門市民對外勞的看法

吳若湘 田青 楊日科

引言

近年來，隨著澳門經濟的高速發展，澳門人力資源出現巨大缺口，據特區政府勞工事務局提供的資料顯示，僅僅2007年首4個月收到僱請外地勞工申請就已4,000多宗，超越去年全年的申請數字。隨著賭權開放博彩業迅速發展，從就業市場中吸走了大批人力資源，使原本人力資源就已不足的中小企業面臨更大衝擊，因而工商界不斷呼籲政府加大力度解決人力資源緊缺問題。另一方面，隨著澳門經濟的騰飛，同時又出現人力不足狀況，大量勞工已逐漸湧入澳門，因而勞工界要求政府提高外勞政策的透明度，切實保障本地工人的就業權益。根據統計局的資料顯示，近年來外地勞工申請數字不斷上升，這主要是因為中小企業人力資源短缺因而申請加致，而勞工事務局表明審批外地勞工輸入的尺度未有放寬，在切實保障本地工人優先就業的前提下，不論申請外勞的企業規模大小，必須符合目前市場標準的條件聘用外勞。由此可見，澳門目前既面臨人力資源的極大需求，而同時由於特區政府的勞工政策所致，又很大程度限制外來勞工進入澳門勞工市場。本研究將針對這一需求與政策限制的問題，通過實證調研，從澳門市民對外勞的接受程度來探究外勞與本澳人力資源的聯繫。

一．研究內容和方法

近年來，澳門博彩業的迅猛發展使大批人力湧入賭場工作，直接導致多家中小企業人力資源不足，因而輸入外勞似乎已經成為解決澳門人力資源不足的根本辦法，那麼外勞的大量湧入是否會影響到澳門市民現有的利益，是否會妨礙他們的就業，澳門市民對待外勞態度又如何等等，基於以上一系列的問題，本研究試圖通過問卷方式採集資料，以此來進一步分析澳門市民對外勞的接受程度，因此

本研究將通過調研瞭解澳門市民對外勞的態度，從中分析他們接受外勞湧入的程度。在此基礎上，本研究還將深入分析被訪談者的個人統計資料來研究不同學歷程度以及不同工作層次的澳門市民對外勞的接受程度。

本研究首先進行了一系列的文獻分析，從澳門現有統計資料和資料來分析澳門人力資源的現狀。為了瞭解澳門市民對外勞的看法，本研究進行了實證研究，採用電話訪談的方式對澳門市民進行調研。

二．澳門人力資源現狀分析

（一）高學歷人才短缺

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資料表明，2005至2006學年終，高等教育的學生為15,927名，較上一學年增加14.0%；本地學生佔73.5%。接受非高等教育的學生總數共91,398名，較上一學年減少3.2%；雖然總體的趨勢相比上一學年有所提升，但也並不理想，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僅佔接受非高等教育人數的六分之一。這一現象的出現與澳門就業的現狀密不可分，長期以來，博彩業和旅遊業是澳門的龍頭產業，特別是近年來賭權開放，賭場大規模的招聘員工，平均每人每月薪酬高達12,000澳門幣左右，同時對員工的學歷又無較高要求，因此直接導致澳門市民的普遍心理就是學歷高低並不會影響就業，只要小學畢業或初中畢業後進賭場工作，基本生活還是有保障的。這一觀點直接導致了澳門高學歷人才的短缺，一些學校的師資、公司的高級管理人才等等只有靠引入外地人才來彌補缺失。



表1. 澳門教育人數統計表

學 生	人 數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正規教育	110,494	108,407	107,325
學前	11,936	11,128	10,216
小學	39,278	37,216	35,187
中學	43,251	43,851	43,751
職業技術中學	2,349	2,245	2,244
高等*	13,680	13,967	15,927
特殊教育	568	555	514
成人教育	96,131	89,480	103,553
每千居民之學生數目	247r	234r	222r

*指澳門特區政府認可的高等教育機構。r 更正資料。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二) 技術性人才不足

由於博彩業與旅遊業的蓬勃發展，導致澳門市民就業主要分為三大部分，一為博彩業，據統計資料顯示2005年約佔34.3%左右；二為酒店業，約佔25.4%；三為製造業，約佔14.9%左右。相比較這三大行業在2004至2006這三年間，製造業與酒店業的比例有所下滑，而博彩業所佔比例一直在上升。綜合分析以下工作，其中的技術含量普遍偏低，大部份工作不需任何專業知識即可勝任，同時由於澳門政府對本地市民的就業政策較寬鬆，因此初高中學歷的澳門市民也較易就業，這直接導致某些高技術含量的職位缺乏人選，所以一般會選擇向外地招聘來解決。

表2. 按行業分佈的就業人口表

行業	2004	2005	2006
製造業	16.5%	14.9%	11.1%
建築業	8.3%	9.7%	11.7%
酒店、酒樓業等	27.1%	25.4%	25.0%
運輸、倉儲及通訊業等	6.8%	6.2%	6.3%
金融保險、商業服務等	8.6%	8.8%	8.7%
社會及個人服務、博彩業	32%	34.3%	36.4%
其他	0.9%	0.8%	0.6%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三）人才流失率高

眾所周知，澳門的人才流失率是非常之高的，據本研究分析，主要分為以下兩種情況，一為本土人才的流失，二為外來人才的跳槽。

雖然澳門市民中高學歷與專業人才相對較少，但也並非完全沒有，其中有部份出國留學後回澳發展，但因為澳門工作的薪酬福利低於香港，多數本地人才會選擇去香港或國外尋求更好的工作環境或薪酬。而外來人才一般來澳工作都只是一個過渡，多半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後會另求發展。

三．澳門外來勞工現狀分析

（一）企業申請輸入外勞的人數增加

據澳門勞工事務局長孫家雄表示，與往年相比較，今年收到的申請輸入外勞宗數大幅增加，時下許多澳門企業的招聘活動會，應徵者都是在職人士，不免令勞動市場出現“大洗牌”現象，原有人員跳槽後，留出的職位空缺由下一階層來



填補，層層傳遞下去直至最基層的就業人口，這樣的人員流動顯然會影響了企業經營的穩定性。因而，儘管很多公司提出輸入外勞，勞工事務局亦不斷加快審批程序，但申請宗數增加速度遠超審批速度，不過勞工事務局表示審批原則不會改變，如企業只有在招聘不到本地工人的情況下，才可提出申請外勞。

（二）四大支柱產業人手短缺

面對幾乎全民就業，意味著企業“請人難”的局面更尖銳，其中澳門四大支柱行業建築、銀行、製造、博彩業等行業都大感經營困難，亦幾乎都與人力資源不足有關。近年市場人力資源短缺，各行各業矛頭都指向博彩業，但澳博董事蘇樹輝表示，人手如此短缺，市場還存在“有工無人做，有人無工做”的問題。澳博表示已降低請人要求，但依然面臨人手短缺困境，更預告今年要再增聘三四千人，眾所周知博彩公司一向開出“高薪厚職”吸納人才，當下也慨歎人手不足，那麼其他行業情況更不言而喻。建築業代表表示，因人手不足，去年該行業輸入逾五千名外勞，現時建造業大多數工種就業率保持七成以上，部份甚至全就業。不過，該行業工程複雜而且對技術要求越來越高，但本地工人技術不足，因而只能向外地招聘勞工。銀行公會主席指出，儘管採取措施挽留人才，但去年業內人員流失高達雙位數，這一問題若無法緩解，最終必將影響整體經濟發展。以上行業普遍面臨著一個問題就是人手短缺，但有部份工作對員工技術有一定要求，本地市民難以勝任，需聘請外勞，但外勞的湧入是否會一定程度上影響本地市民的利益，導致這一問題陷入兩難困境。

四. 澳門市民對外勞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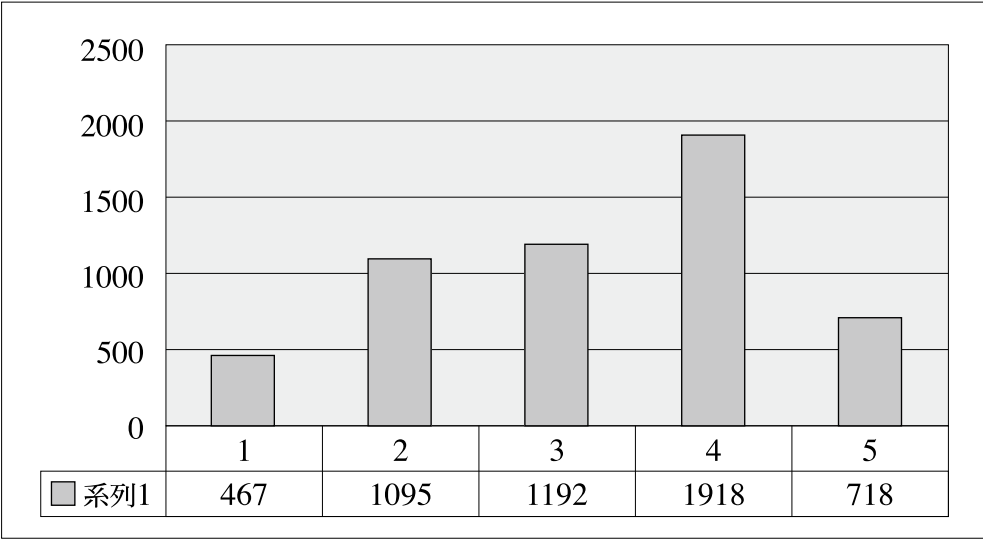
本研究的調研總數為1,000人，最後回收問卷數為770份，以電話訪問的形式隨機抽取澳門市民進行調研，本島、路環及氹仔三地分佈均勻，確保所抽取的資料樣本的全面性，同時能真實地反映澳門各地區、各階層市民的真實看法。問

卷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為澳門市民對外勞的態度與接受程度的調研，例如：澳門市民是否認為輸入外勞會損害本地就業的利益、外勞的湧入是否會使公司原本的人際關係變得複雜等一系列問題。第二部份為市民的個人資料，如：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及工作職位層次等等。

(一) 接受程度與態度

在對澳門市民進行電話訪問時搜集來的770份問卷中發現，澳門市民對於輸入外來人才表示完全認同的只有32人，而表示認同或中立的佔217與205人，其餘316個市民表示反對，計算平均數為2.79，大部份市民處於不同意與中立這兩種態度。

表3. 問卷選項1-5的人數統計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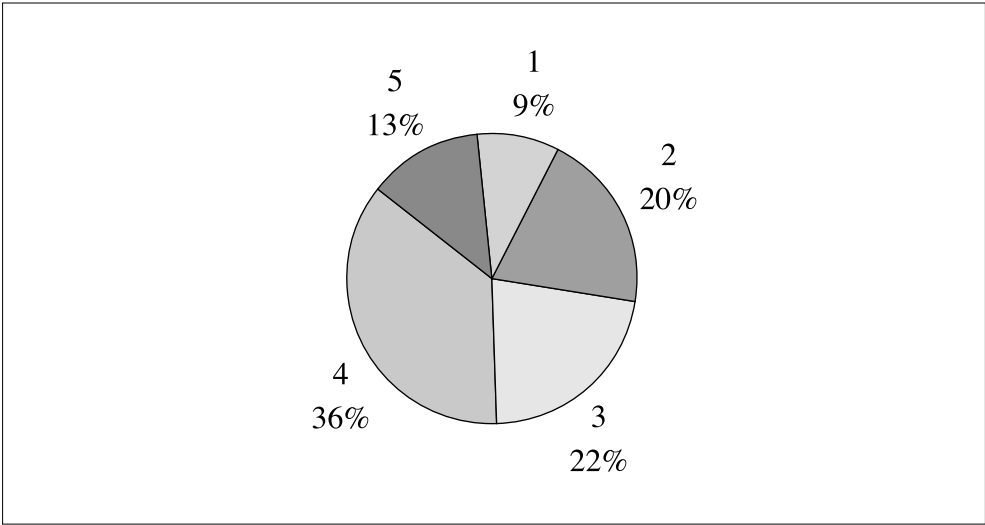
橫軸表示問卷的1-5水準選項，縱軸表示人數
資料來源：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所

進一步的統計中發現，在受測的770名澳門市民中，有將近530位市民認為輸入外勞會損害本地就業人士的利益，僅有100位認為不會損害他們的利益，計算平均數為3.79，偏向於4，說明大部份澳門市民還是對外勞具有一定的抵觸情緒的，他們認為外勞直接或間接的傷害到他們的利益；而對於外勞的大量湧



入，受訪問的770名澳門市民中有453位覺得外勞的湧入使得自己公司的人際關係變得複雜化；254位市民對引入外勞有利於公司效率持中立觀點，而在被訪問的770位澳門市民中有將近440位認為外勞的引入會使他們加強本身的競爭力意識，從而激勵自身；同時也有將近500位市民認為輸入外勞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所在，但在770位市民中有290位認為輸入外勞對澳門經濟的長期發展沒好處，但也有270位認為是有好處的，所以綜合以上問題統計所有選項，繪製成下圖，從圖中不難發現選擇四（持同意觀點）的市民較多，有1,918人佔36%，接下來是選擇3（持中立觀點）的市民佔22%，緊接著是選2（持反對觀點）有1,095位市民，佔到20%。

表4.問卷選項1-5人數所佔比例表



從以上資料分析可以看出，大部份市民對澳門輸入外勞還是持同意觀點的，他們認為輸入外勞可以使自己公司原本的工作更有效率，也可以激勵本地人競爭，進而可以促進澳門經濟的發展，同時，他們也認為輸入外勞是解決澳門現有問題的關鍵。

（二）人口資料對態度的影響

經過對市民個人資料的分析，在770名受訪的澳門市民中有176名處於大

專、大學或以上學歷，本研究把這176位市民的資料進行重新整理計算，其中對於澳門需要輸入外來人才這一問題的平均數為3.19，與前面對770位市民的資料進行計算得出的2.79高出了0.4，相比較這176位高學歷市民對於輸入外勞是比較贊同的；而在詢問輸入外勞會損害本地就業人士的利益問題時，平均數從原來的3.79下降到3.66，同樣對於輸入外勞會使公司原本人際關係變得複雜的問題上，這176位市民資料的平均數3.19也是低於原來的3.52，以上兩個問題的資料結果顯示，高學歷的澳門市民認為損害利益並沒有那麼嚴重，同樣對於人際關係的複雜化也沒有那麼強烈的反應。與此同時在詢問輸入外勞會激勵本地人加強自身競爭力、輸入外勞有利於經濟長期發展等問題上，平均數均高於原本的資料，研究結果顯示：學歷較高的澳門市民對外勞的接受程度高於學歷低的市民。

本研究再把受訪的770位澳門市民中屬於公司高層的34位市民的問卷資料進行分析，在對於澳門需要輸入外來人才及輸入外來人才對經濟長期發展有好處這兩個問題上，平均數為3.35及3.14，均高於前面兩種統計資料，這表明位於高層職位的市民對於外勞湧入持更認同觀點；在詢問輸入外來會損害本地就業人士利益及使公司人際關係複雜化這兩個問題上，平均數分別為3.59及3.09，均低於前兩種分析。而在詢問輸入外勞是解決澳門經濟發展問題的根本辦法這一問題上，處於高層職位的市民選項平均數為3.26，低於前兩種市民選項資料。研究結果顯示，處於高層職位的澳門市民對外勞湧入的接受程度高於其他兩種，但在輸入外來人才是解決澳門經濟發展問題的根本辦法這一問題上他們的同意度低於前面兩種。



表5.對外勞的態度

對外勞的態度	問卷資料的平均數		
	澳門市民 (n=770)	有高學歷 (n=176)	有高層職位 (n=34)
澳門需輸入外來人才	2.79	3.19	3.35
輸入外勞損害本地人利益	3.79	3.66	3.59
輸入外勞使公司人際關係複雜化	3.52	3.19	3.09
輸入外勞使公司更有效率	2.84	3.12	2.97
輸入外勞激勵本地人加強自身競爭力	3.32	3.61	3.21
輸入外勞是解決澳門經濟發展問題的辦法	3.58	3.90	3.26
輸入外勞對澳門經濟長期發展有好處	2.88	3.08	3.14

雖然從目前情況來看趨向外勞對本地工人就業存在負面影響，本研究認為，我們的眼光不要僅局限於外勞湧入與澳門人力資源上的衝突，而忽略他們對澳門經濟發展的貢獻，為了更清楚反映外勞對本地生產總值的影響，本研究利用了2006年的資料，做一個“類比”（simulation）計算，並詳列於下表中。

表6. 輸入勞工對本地生產總值的影響

06年在澳外勞數目	44, 499
	<u>對GDP貢獻</u>
與本地工人生產力相同	15.8%
較本地工人生產力低30%	11.9%
較本地工人生產力低50%	8.0%

資料來源：筆者計算；原始資料來自“本地生產總值2006”報告，“2006人口估計”報告及“2006年統計年報”。外勞對本地生產總值的貢獻，是以06年外勞數目乘以當年就業工人平均生產總值估計

五．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外來勞工與本澳人力資源這兩方面，從問卷資料分析來看，澳門市民對外勞的態度並不抵制，相反他們普遍認為澳門輸入外勞更有利於地方

發展，但從實際情況來看，外勞的湧入似乎對澳門市民的生活就業帶來了一定的威脅，但根據美國著名經濟學者蒙代爾（R.Mundell）的分析，當經濟體系處於全民就業的狀態時，輸入勞工可降低通脹率，並可帶動實質經濟增長。從輸入勞工的微觀層面分析，若外地勞工實際從事本地勞工不欲或不能從事的生產工作，那麼起碼在短期來說，減少外勞的數目將不會對本澳的就業情況有任何正面的影響。本研究提出下列建議：

1) 從福利制度上保障澳門居民的利益

從長遠看，澳門應該從改革現有分配制度和提高社會保障水準的角度出發，來謀求和保障澳門居民的利益。逐步走出引進外勞會損害澳門人就業權益的誤區，以全球化視野來看待引進外勞的現象。從制度上保障澳人的就業權利、社會保障權利，讓外勞為澳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服務，讓澳人和外勞共同為進入新時代的澳門做貢獻。特區政府可以學習和借鑒周邊地區的外勞經驗，從制度上解決輸入外勞所引發的各類社會矛盾。

2) 有關外勞的相關政策改革

隨著大量外勞的湧入，澳門政府不得不承認澳門經濟的發展外勞是不可避免的，那麼就目前澳門的引入外勞政策筆者建議要適度的改革，不應該一味的抵制外勞湧入，與此同時一些企業也不應該因低報酬而過多的引入廉價外勞，一切都要以實際情況為準繩。例如可以提高聘用外勞成本以及徵收輸入外勞稅。

3) 開發本土青少年這一人力資源

眾所周知，澳門人力資源相當不足，那麼現在與其向外招聘大量的勞工，還不如花心思培養本地的青年人，因為青年人充滿幹勁和活力，他們不僅是社會人口的重要組成部份，也是社會未來發展的關鍵因素，如果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發展他們，相信在未來的幾十年中澳門的人力資源都不會像現在這樣短



缺。因此如何促使青少年健康及全面發展，提升青少年的綜合素質與能力顯得尤為關鍵，使其能成為澳門現在、未來發展所需之人才，所以筆者認為加強對青少年的人力資源開發勢在必行。

六．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主要是以電話訪問的形式來收集資料，雖然是對澳門本島、路環及仔地區進行隨機的抽樣調研，試圖能盡量全面涵蓋各地區、各階層市民，但由於是電話訪問的形式，其間還是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性，如家庭接電話習慣（經常由男主人接電話，那麼就很容易忽略女主人的態度，反之亦然）、電話訪問的時間段、接電話者的心情等等都會對問卷的資料有所影響，所以本研究採用770份問卷的資料，希望可以盡量中和其間的限制因素。

參考資料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HYPERLINK “http://www.dsec.gov.mo/c_index.html” http://www.dsec.gov.mo/c_index.html

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澳門外勞調研資料

不要要求政府為你做什麼！

葉建華

前美國總統肯尼迪：「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而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麼。」這句名言（不是至理），至今仍被許多人引述。然而，被森穆遜（Paul Samuelson，1970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認為是90年代東歐國家由社會主義變化為資本主義的過程中，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佛利民，芝加哥學派的領軍人物，在其1962年出版的名著《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中，便對上述肯尼迪的名言大唱反調。佛利民高舉自由經濟及小政府的旗幟，經濟學行內無人不知。佛老是如此反駁的：「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的理念，與自由人（Free man）對自己的目標負上己責的理念相違背……。相反，自由人不會問國家能為他做什麼，也不會問他能為國家做什麼（The free man will ask neither what his country can do for him nor what he can do for his country）。」

「世上沒有免費午餐」（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是佛老的至理名言。佛老作為自由經濟（市場經濟）的領軍人物及捍衛者，與主張政府干預市場的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於上世紀打了一場硬仗，把凱恩斯殺個片甲不留。君不見俄羅斯、波羅的海三國、保加利亞及羅馬尼亞均由社會主義的大政府轉為資本主義的小政府；佛老1988年及1993年兩次訪華均受到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黨總書記接見；英國鐵娘子戴卓爾夫人毫不諱言說自己是佛利民的信徒；前美國總統列根採納佛利民的低稅制小政府的政策等，可見佛老勝得多漂亮。佛老更是貨幣主義理論的倡導者，又是1976年諾獎得主，其理論博大精深。然而，1977年一位以色列官員對佛老說他的經濟學理論內容廣泛，不可能用一句話來概述其精要。佛老回應：「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是我的經濟理論的全部，其餘只是枝節！」列位看官，立法會議員及學者，沒有免費午餐這個理念，佛老這麼重視，當你提出要政府為市民做什麼的時候，有否考慮到市民的負擔？



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中，佛老這樣演繹自由與「沒有免費午餐」的理念：「美國法律強制美國公民付出一成收入來購買由政府管理的退休金計劃，美國公民是被剝奪了個人的自由！……事情發展到美國農民認為強制老年退休計劃侵犯了他們的自由，拒絕付稅及享受福利（筆者按：不要問我為國家做什麼，也不問國家為我做什麼），最後，農民賴以為生的家畜被迫拍賣以繳付退休保障金！」

沒有免費午餐，退休保障羊毛出在羊身上，一個熱愛自由的人當然不會問國家為他做什麼，因為國家為他做的事，到頭來付出的還是自己！強迫公民服兵役的國家，對於自由人來說，天可憐見。

佛老對自由的執著及熱愛，與筆者的性格不謀而合，一脈相承，我看到許多「強制性」的政策，大多會口誅筆伐。香港推行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筆者早年就在《澳門日報》的每周專欄中大肆批評。個人的消費，儲蓄，退休準備的行為，干卿底事？何需政府來管制！自由人自己負責，如此，我們才看到詩仙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千古絕唱。佛老、李白及我均熱愛自由，號稱自由民主鬥士及為民請命頭上戴著光環的立法會議員，真的需要看看佛老的《Capitalism and Freedom》及李白的《將進酒》，才可了解自由的真義及強制退休金的弊端。假如像某些議員及學者所提議的退休金計劃在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60年）實施，曹雪芹因為須要強迫供款，可能只會留下六十回《石頭記》（留存至今是八十回，後四十回是高鶚狗尾續貂，完全違反芹溪居士的原意）以供後人欣賞，將會是中國文學的重大損失。

何特首在立法會的答問大會上，指出專家學者不要只提出問題要政府解決，而要拿出具體解決問題的方法，看罷這段新聞令筆者想起一件事。經濟學家許多時評論一個政策的效果時，往往會一方面又這樣，但另一方面又那樣，前美國總統杜魯門曾公開說他需要一個「獨臂經濟學家」，因為他對「On the one hand……On the other hand」的學者感到厭煩（damn tired）！是的，諮詢機構或參

政議政人士向政府進言，要指出問題，也要提出解決方法，更重要的是考慮機會成本的問題。

資源有限 (Limited resources)，人的慾望無限 (Unlimited human wants)，便自然需要競爭 (Competition) 來解決資源誰屬。社會主義大多以官階來界定資源 (如樓房及汽車) 誰屬。資本主義大多以金錢來決定資源誰屬。機會成本 (Opportunity cost) 這個概念是經濟學的重心，有份量的經濟學家，不懂機會成本的，我從來沒有遇上過。假如不考慮機會成本，經濟學便自廢武功。

政府庫房收入有限，醫療用多了，其他方面 (如教育) 便要減少。假如不減，便需向居民及企業加稅。這便是「世上沒有免費午餐」的原因。一幅土地，只可供拍賣或建社屋，這便是機會成本的概念。民主的代價十分大。透過居民選舉出來的議員，要向選民交代及連任，向政府進言便往往只為本界別利益而向政府爭取有限的資源，如此自然不能從澳門整體利益出發，更枉論考慮機會成本的問題。「為民請命」的議員要求政府增加福利，我想指出，福利主義是條單程路，通常只能加不能減，否則政府會捱罵。鄰埠香港綜援濫發時有所聞，綜援亦成為港府沉重的財政負擔，港人因而納重稅以養起領綜援人士，並要而減低消費 (Consumption) 及投資 (Investment) 而拖慢本地生產總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的增長步伐。還要開徵銷售稅而令港人群起而攻之，港府官員何其愚蠢！

經濟學經常作出假設，筆者假設一個社會只有兩個家庭，家庭甲兩夫妻勤勞節儉天天出海捕魚，生活困難因而未有打算生小孩。而家庭乙兩夫妻懶散不工作並天生天養育有四個小孩，看官，家庭甲應否補貼家庭乙？香港的福利主義綜援制度合理嗎？

在最近的一次公開市民論壇上，筆者就提出了兩個問題，要求在場的記者及市民思考。政府要解決的是交通擠塞問題或是要讓全部市民每人均擁有汽車？政



府要解決的是低收入人士的居住問題或是要讓全部澳門居民每人均擁有物業？筆者的答案是政府只需解決交通問題及低收入人士的居住問題，重大投資擁有資產如汽車物業的問題，由市民自己努力吧。當場有位市民向我這個業界代表（其實我比較喜歡以經濟學者的身份出席該論壇，因受到佛老經濟大師的教誨，筆者的文章及對公共政策的發言，從來都以整體利益出發。不屑，也不會為有損整體利益而有利狹隘的行業利益而說過半句違背自由經濟學信念及違背知識份子良知的話）提出質疑：「我一家五口，育有三孩，因帶孩子我不能外出工作，買不起私人樓宇，政府要幫我解決問題。」筆者：「多建社屋便能解決你的居住問題。」市民：「不，我要經屋。」主持人見我們爭持不下便打完場。其時筆者心中有氣，我有不少年青朋友兩夫妻計劃生育，租屋住，辛勤工作來為自己的屋仔、車仔、老婆仔及BB仔的理想（香港大學八十年代的四仔主義）按步就班地實踐，這個市民的質疑，讓我回想起上述兩個家庭的假設。

在海景地皮上興建居屋（等於澳門的經屋），紅灣半島事件引人笑柄令港府進退失據，皆因港府官員不懂機會成本為何物。貴重海景地段應交由私人發展商開發，其收益可以在兩至三個便宜地段興建公屋（澳門的社屋）以解決港人的居住問題。港府是錯上加錯，一錯要市民擁有物業，二錯要擁有海景！澳門現時的經屋政策存在問題，第一是沒有資產審查制度，第二是經屋售出後不需向政府補地價。興建經屋，政府少了一筆屬於你同我及廣大澳門市民的賣地收益，我和你資助了三數百戶人擁有物業，數年後他們可以賣出獲利袋袋平安：所以經屋應該停建，即使歷史遺留下來要建，對於新申請者也要引入資產審查及補地價的制度，才能還富於民。

「為民請命」「救世主」頭上戴著光環要求政府多建經屋的立法會議員，其言論看似為市民著想並謀幸福，但你是往五十萬市民的錢包裡拿錢走，機會成本的概念，議員需要學習。民選議員要求政府大派福利及「免費午餐」，導致資源錯配、資源浪費、增加政府庫房支出並增加納稅人稅款，是全世界民主制度的通

病。我相信，一個英明而獨裁的領導人制度，比為爭選票而要為各界利益爭奪資源的民主選舉制度來得優越！更重要的是，廣大市民在看到「救世主」議員們在要求政府為你做什麼的時候，要想到資源如何運用的機會成本問題，要想到世上沒有免費的道理，增加福利及開支，你我都有份付出！如此，方能考証議員是否為澳門整體利益出發，是否站在五十萬廣大市民的立場看問題而向政府進言。

中國人的優良傳統是刻苦耐勞，自強不息。可是港澳同胞受到議員的鼓動及代議政制民選制度的影響，港澳市民卻依賴政府幫助他們擁有物業及解決問題。改善生活環境，必先由自身做起，不能事事依賴政府做其「伸手牌」。2000年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中，說道「政府有所為有所不為」。是的，政府不是萬能的政府，更不能事事插手干預市場，筆者看罷，翌日在《澳門日報》撰文的結語是：「特區政府深明此道，澳門前途一片光明。」六年過去了，證明澳門官員對市場經濟的認同在港府官員之上。市場能解決的事，該由市場解決，其成本往往比政府做的要低。

國際歌：「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要靠我們自己！」回歸以後，要求政府做這做那的言論成為風氣，好像政府做事沒有成本（Cost）似的，筆者「看不過眼」「心中有氣」下筆為文「伸張正義」「以正視聽」，有納稅或即將納稅的兄弟姐妹們，請你們不要再像一盤散沙，組織起來，向增加福利，大政府，並引致要增加稅收而減低你經濟自由（Economic freedom）的言論及政策說：「不！不要要求政府為你做什麼！」

什麼時候 中國人自力更生的優良傳統 離我們遠去，
什麼時候 澳門人理性分析的邏輯思維 都成了記憶，
誰能告訴我？誰能告訴我？
是我們改變了議員，
還是議員改變了我和你！



和諧社會

愛麗斯

古人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話無論對個人、企業乃至城市的發展與成就取得都可謂至理名言。如能俱備天時、地利、人和三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則無疑擁有了最佳的發展條件及機遇。其中，天時、地利為客觀因素，而人和往往為最關鍵及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如佔盡天時、地利，而欠人和，則難免各行其事，錯失良機，事倍而功半；如三者兼具，充份結合，人心所向，眾志成城，方可把握時機，利用地勢，將其轉化為實際成果。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七年多來，一掃回歸之前連續多年經濟負增長、百業待興的陰霾，整體社會穩定，經濟日漸繁榮，成績實為不易，足以印證“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三者結合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所起的重要作用。祖國國運昌隆，經濟快速發展，給予澳門的大力支持和各項優惠政策可謂“天時”；澳門背靠祖國，位處經濟最發達的珠三角地區，此乃“地利”；在行政長官何厚鏵領導下，特區各界、各階層致力維護社會祥和，共謀發展，則為“人和”。可以說社會和諧是澳門回歸以來取得成功的重要條件，也是澳門未來可持續發展，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的必要條件和重要保證。

資金、資訊、科技等因素對社會可持續發展固然重要，但始終離不開人這一重要因素。社會不同界別、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群體，只有團結協作，互諒包容，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生活中的磨擦，減低社會風險和代價，降低社會的運行成本，消除矛盾激化的潛在因素，避免隔閡、分化和對立，有利於增加社會凝聚力，激發創造力。“家和萬事興”、“和為貴”這些傳統文化精華中的「和」，蘊含著深刻的哲理，對於澳門可持續發展極具現實意義。

近年，隨著澳門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人力資源、城市規劃、交通、住房、環保等方面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各種社會矛盾也進一步凸現，各種意見、聲音

不絕於耳，昔日安寧、閒逸的小城，發展的主旋律中似乎多了些不和諧的音符。求和諧，促發展是全體澳門居民的共同目標和期望，如何化解矛盾，協調各種利益關係，成為發展過程中，急待解決的問題。對待問題和矛盾，既不能視而不見，聽之任之，也不應言過其實，過份誇大，應以實事求是之態度，理清脈絡，分清主次，妥善處理。矛盾存在於事物發展的始終，任何社會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遇到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或矛盾，在所難免，這是普遍性的規律。和諧社會也不是沒有矛盾、沒有利益衝突的社會，反而是有能力化解利益衝突，實現利益基本均衡的社會。社會矛盾處理得好，特區就可能較順利地進入一個新發展階段；反之，則可能社會分化加劇，社會矛盾激化，發展出現阻滯。而妥善解決問題，掃清前進中的障礙，則要形成和諧包容的社會氛圍和最廣泛的團結。以和諧促進發展，用發展求和諧，兩者相輔相承。有了和諧，才會穩定，有了穩定，社會經濟才能保持可持續發展。

特區政府已將建設和諧社會作為發展目標，完善法制、維護社會公平、健全社會利益協調機制等都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組成部份，這是一個系統的、長期的過程，不可一蹴而就。政府的作用固然重要，然而，這是一個需要全民共同參與的巨大社會工程，僅靠政府的努力是不夠的，需要廣泛團結社會各界、各階層人士，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凝聚人心，形成促進社會和諧的合力，即必須“人和”，才可達致。社會各階層都是社會的寶貴資源，是特區建設最廣泛的基礎和力量源泉，“人和”是澳門特區今後可持續發展最為重要財富。

一個社會如果沒有和諧與團結，社會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群體，不能正確認識和處理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各自為政，顧我而忘他，互不信任、彼此猜忌、錙銖必較，必然導致無謂的紛爭與內耗，偏離良性發展的軌道，拖慢整體發展步伐。

我們追求的和諧，並不是毫無原則的一團和氣，不是隨波逐流，人云亦云，盲目附和。社會不同界別、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群體，所處環境不同、價值理



念不同，對問題的視角、掌握的背景資料不同，對某些事物有不同認識，意見相左，多元並存，不足為奇，正所謂“和而不同”。在大目標不衝突的前提下，應包容差異，尊重差異，相互信任，彼此包容，換位思考，坦誠交流。在爭取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應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理性合法表達意見和訴求，多建務實之言，多獻有用之策，多說有利團結之話，多做有利和諧之事。作為政府，應廣開言路，樂於聽取各界聲音，對待批評，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胸襟廣闊，勇於承擔，在更大的範圍凝聚智慧、共識和力量，為科學決策匯集客觀的、充足的依據，在更深的程度上統一意志和行動。只有這樣，才有利於形成具有活力、順暢和諧、穩定有序的發展態勢和社會局面，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才能在不一致中得到化解。

“人心齊，泰山移。”只要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各階層團結一致，和衷共濟，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夯實和諧這一社會價值體系基礎，使各類社會資源充份聯合，促進社會的有序化和一體化，充份利用天時和地利之優，則澳門將在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上，不斷穩定向前，再創佳績。

安逸與怒吼之間

水月

一場五一遊行，使鄰近地區及澳門本地人都震動了，原來在幾年間急速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及利益的另一面，卻是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連一向安逸的澳門人也忍不住，讓一直在醞釀的沉默風暴爆發了，真的是“官迫民反了”嗎？一向安逸平和的澳門人在這個新時代變成了憤怒的暴民了嗎？

為什麼怒吼

大量賭場的開業，高薪厚利的招聘活動，早就沖昏了澳門人頭腦，但隨之引起的人力資源問題，在興建中娛樂場，工程業勞工不足導致外勞黑工流入已令一眾勞工階層怨聲載道，而開業的娛樂場需求大量的人手卻要從外地招攬；隨著物價的上升，青雲直上的樓價已讓小市民積壓了一肚子的怨氣。而回歸以來一個接一個的大型基建，填海造地，建設沒有實際作用的建築，攪了一個又一個毫無建樹的運動會，還讓一個司長級的高官“證據比較確鑿”地從中貪污了八億元——這巨貪案的揭發，正是將回歸以來平靜和諧局面一下子敲破，之前早惹得市民怨聲載道的公共工程的底牌一下揭出，彷彿一下子整個澳門都罩在貪污黑幕中，似乎每一個官員都有其貪污的嫌疑，市民的怨氣，就由積壓變成了爆發，在五一遊行引發了史無前例的警民衝突。

在同一條大街上，有著一群怒吼著的澳門人，但大街另一旁卻有著一群冷眼旁觀的澳門人，他們沒有加入遊行中，反而像一個觀眾般的看著場面火爆的遊行，一冷一熱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

如果說這種冷眼旁觀正是澳門人一貫的態度，那麼走在大街上怒吼的就可以說是一群新澳門人了。



誰在怒吼

不像香港，回歸前澳門從不是一個百家爭鳴的地方，被立場所限制的報章，從沒風行過的時事評論刊物，使除了真正關心澳門的人士會發表對社會的意見外，一般坊間澳門人對時事的討論只止於在茶座間的閒談，且也止於談論，申訴一下悶氣而已，他們從沒想過自己對社會不滿和批評能改變些什麼。但在回歸後，出現了一群“新澳門人”，他們不如澳葡時期的澳門人般，他們在新時代的洗刷下，他們更關心社會，對社會的不公平無法忍受，並相信人民的力量可以改變不合理的現狀。

“新澳門人”可分為兩類，一類就是八十年代後出生，在回歸中成長的青少年，他們都是剛離開學校踏入社會或是準備投入社會的一群新生代，安逸無爭的澳門生活就只存在他們的童年，他們成長在回歸後的，他們迎接了賭權開放後的黃金時代來臨，功利的社會重寫了他們的價值觀，而網絡文化的衝擊，使他們接受了包羅萬有資訊，他們對自我，對社會的感覺的討論媒介不如上代般的止於茶座談天，他們從網絡的聊天工具、討論區以及blog（網誌）都可以互動的方式暢談天下事，他們步出社會後面對的是一個充滿競爭的澳門，但亦同樣地察覺到這個時代的不公平和不合理，他們在網絡媒體去表達自己對社會的感覺、不滿，甚至在網絡上團結了一個個的社群，他們認為抗爭就會使身處的社會得到改善，最起碼不會讓自己受到蒙蔽。這一群年青的新人類更直接地影響了他們的前一代欲言又止的知識份子，中年中產的一代人也離開了茶座，利用各種媒體發表他們對社會的不滿了。

另一類“新澳門人”就是自九十年代開始後火速膨脹的外來人口，他們以為移居到澳門後就能改善到生活，但大部份，尤其是知識技術偏低的一眾新移民，發現在澳門並沒有如想像的優越，還是要一如以往的辛勞工作，克勤克儉的在小城應付生活，但在還未被“同化”為安逸澳門人之前，就面對著澳門經濟騰飛，看著機會似乎無處不在，但自己又未能把握到最好的，他們產生了不滿，而同時

亦影響到與他們生活在同一個階層的草根澳門人覺得不能默默的捱下去，要在這個社會上爭取更好的權利。而這一群渴望著改善生活的草根階層，成為了五一遊行的主要參加者。

憑什麼怒吼

可是在冷眼旁觀的安逸型澳門人眼中，這種怒吼的聲音卻是人民對政府的苛索，一群希望用自己的澳門人身份去無條件享受經濟成果的人的叫喊。

“新澳門人”怒吼著反對輸入外勞，是不現實的，每個人都明白到現時多間大型娛樂場開業，澳門根本就無法供應到足夠人力資源，而當已吸收了大量的人才及勞動力的大型公司仍是在喊著人手不足，有更多的中小企因人手不足而面臨危機，人力資源短缺是可見的事實，這是社會都理解到的。而喊出反對輸入外勞這句口號的潛台詞其實就是說：請將最好的職位先留給我們，當大型娛樂場要在澳門開業賺錢，高薪低勞動的好工作就應首先提供給我們澳門人，我們留下來的低層工作沒人願做時就分配給外勞就吧。作為人望高處，希望自己得到理想的待遇是合理的，但靠的應該是自己的實力和努力，而不是依賴我們的澳門居民身份證。

“新澳門人”怒吼著要肅貪倡廉，在這句世界性的老口號之下的潛台詞也不過是不願見到政府溢滿的財政掉進讓互相勾結的奸商貪官懷裡，要取之於民而用之於民而已，但諷刺的是，政府的財政絕大部份都不是取之於民的，當然，這不是一個貪污的理由，但政府正是以博彩稅的“不義之財”用以發展經濟，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而另一部份的財政作為保障型的福利制度。誠然，我們政府還做得未夠好，但相信政府是正是向著一個有發展機會和有保障福利的和諧社會努力的。

“新澳門人”怒吼著政府浪費財稅，為什麼不還富於民呢。但難道澳門真的要成為一個全民免稅再送畢生醫療保障、按成年人口派發居住單位、不用工作也



有社保加綜緩的超級福利城市嗎？任何一個政府都不可能創造這樣的一個福利社會去飼養一群不事生產的人。政府在只會以自身的優勢去開展資源讓市民有更多更好的機會去改善生活，而這些機會是要自己去爭取的，去把握的。

在從事工程工作時，曾在為擴建中 仔運動場向身邊的地盤工友發過牢騷：“剛起完不久又要擴建，就像再起多一次一樣，為什麼初規劃時不造大一點，真是勞民傷財啊。”但工友對我的回應卻是：“政府多錢就要這樣用的嘛，多攬點工程，讓我們多點工開，讓我們多賺點嘛，哈哈！”這句說話對初涉社會的我有如當頭棒喝，政府正是以他的有利的資源為市民創造了機會，能否在這個機會中爭取到，是要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要將政府開展資源的財力無條件的送贈市民。

在澳葡政府時期的澳門人，沒有向當時的政府要過什麼，因為他們明白，葡國人打從第一步踏上澳門土地的一刻起，就是侵佔者、掠奪者，葡國人發展澳門，只是為了能從中撈得更多的油水而已，當時的澳門人還是腳踏實地，自力更生的在小城生活下去，也是這種對政府沒信心、沒依賴的生活態度，造就了一個安逸無爭的澳門人形象。但回歸後，在得到祖國的支持下和開放賭權的大好形勢下，經濟的迅速發展，政府的財稅收入一天比一天多，滿瀉的資源使政府可以不惜工本的去進行大規模的社會建設以發展經濟，而新的特區政府一改舊時代的方針，宣佈以以民為本的政策去聆聽市民，讓市民申訴需要並提供援助，但這卻使得新澳門人出現了一種伸手就要的心態。

當年我們父輩的澳門人憑著自己的努力和奮鬥去生活，以幾千元的工資，花上十數年去供一所幾十萬居所，還要養活下一代，相對現今一代人的急功近利，想同時享受經濟發展帶給他們的高薪但又懷念昔日的低生活水平，自身條件不足以投入理想的高薪舒適工作時，就喊著資源分配不均，就像一個被寵壞的孩子一樣。

時代在前進著，我們再懷念，也不能回到那寧靜的小城時代了，在面前這個燈火輝煌的國際賭城中，愛好安逸的澳門人當要調整心態去面對挑戰，新生代和新移民不應只會舉起自己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去怒吼，應要好好的去充實自己去迎接難得的機遇，把握機會。



編
者
語





編者語

本澳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經濟結構轉變也引發了諸多社會問題，“發展不適應症候群”已在本澳出現。為推動更多市民共同思考本澳未來的發展方向，本中心於去年年中，舉辦了主題為“齊為澳門動腦筋——動態和諧，你我共建”大型座談會，以凝聚各方智慧，共探和諧。會上，本澳多個社團代表、知名人士、市民和本中心成員等，分別從不同的角度發表其真知灼見，本中心隨後亦迅速把有關精闢言論結集成書，付梓發行。

事隔一年，和諧澳門的討論仍方興未艾。有這麼一種跡像，在討論建構和諧澳門的議題上，澳門人正從形而上的價值取向發展至探索責任承擔的實際工作上。毫無疑問，构建和谐澳門的責任不能，也不應該全由政府承擔，民間組織、機構、以至每一社會成員都應肩負其應有責任。這當中的道理很簡單，政府的權力源於社會，她只有在社會成員的不斷監督、糾正和支持下，才有可能逐步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優化。所以，當人們對政府有所要求的同時，就推卻不了協助政府成長，糾正政府錯誤的責任。政府、社團和市民在建構和諧澳門的過程中如何做好自己，扮演好自身的角色，正是我們長期所關注的。在本期會刊中，和諧澳門的討論興致盎然。誠然，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的意見，並不代表本中心的立場，我們將之結集出版，是希望達致啟發更深層思考，集思廣益的目的。

今年是本中心邁入成立十周年，中國人傳統習俗是“逢十”一慶，“十”有著九九歸元，承先啟後的像徵意義，更重要的是，我們要藉此良機總結經驗，前瞻未來。九年多來，本中心與全澳市民一起，見證和參與了“一國兩制”的實踐。我們一直秉持“愛國愛澳”的基本價值觀，堅守“是其是，非其非”的處事原則，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在積極建言的同時，從未放棄監督和糾正政府施政不足的公民責任。也不用諱言，我們的工作雖有成績，但也有很多不足，因此，在本中心今年的會員大會上，會員們除對會務發展提出不少建議外，還強



烈要求本中心需堅持“積極改進，勇於承擔”的辦會精神。本期會刊為此作出了報導，並介紹了新一屆領導架構成員。我們衷心期望各界友好對本中心未來的會務發展多作指正和支持。

此外，為加強與各界溝通，第一時間發佈會務訊息，本中心的全新網站已於今年6月1日正式啟動，歡迎登錄：<http://www.cpedm.org.mo>。如您對本期會刊內容，或本中心的各項工作，有任何意見或批評，亦歡迎隨時致電853-28780124，傳真至853-28780565，或電郵cpedm@macau.ctm.net與我們聯絡。最後，對一直支持本中心會刊出版及各項會務工作的朋友，致以衷心謝意。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發展策略》徵稿

1. 《發展策略》是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編輯出版的不定期綜合性學術期刊。
2. 本刊的出版是希望透過理性、客觀的討論和研究，推動澳門整體健康持續發展，並希望透過百家爭鳴，共同提高學術研究水平。
3. 本刊出版主題以澳門社會發展的策略及評論為主，具體主題則每期不同，歡迎瀏覽本中心網頁，或以電郵方式查詢。
4. 本刊除發表會員及本澳學者專家的有關論述外，亦歡迎境外專家學者惠賜鴻文。
5. 來稿請以中文撰寫，字數不拘，以1,500 4,000字為較適合，文責自負，請勿一稿兩投或多投。
6. 來稿請詳列作者真實姓名（刊登時可採用筆名發表）及聯絡資料。
7. 本中心對來稿有編輯及出版的最終決定權。

來稿請電郵至cpedm@macau.ctm.net或郵寄至澳門畢仕達大馬路26號中福商業中心7樓A座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發展策略》 NO.15 (July 2007)

出 版：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封面設計：吳衛堅

排版設計：堅藝創意

印 刷：城市印刷廠有限公司

版 次：二零零七年七月（第一版）

印 數：1500本

定 價：澳門元40元正

I S S N：1813-288X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